



戴高乐

DAI GAO LE

外国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戴 高 乐

尹子云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壮志——职业军人·····	(1)
第二章	次长——主席·····	(23)
第三章	荣誉顶峰——退隐归田·····	(56)
第四章	光辉篇章——大国地位·····	(80)
第五章	回天乏力——八十而终·····	(115)

第一章 少年壮志——职业军人

夏尔·戴高乐，这位 50 岁才开始发迹的法国伟人，于 1890 年 11 月 22 日诞生在法国里尔市公主街 9 号一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他袭用的是他伯父的名字。戴高乐家庭从 16 世纪到 1789 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止，祖祖辈辈都在司法界作官。这样的家族同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是属于那种忠于法国古老传统的偏于守旧的家庭。1789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戴高乐家庭的老传统来了一次猛烈的冲击。在巴市议会当法律参事的夏尔的曾祖父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浦·戴高乐在所向披靡的革命风暴中被捕入狱，获释后没有回到司法界，到拿破仑的军队里掌管邮政。他的父亲朱立安—菲利浦·戴高乐在北方当了教员，和敦刻尔克一家烟厂老板的女儿约瑟芬·马约结了婚。戴高乐家族以王朝官吏之家随着 1789 年革命的洪流跨进了 19 世纪，在新制度下食俸。

夏尔的母亲约瑟芬·马约是一位相当有才华的妇女，既聪明又有个性，颇有造诣，还是一位“多产作家”，在《家庭通讯》杂志社担任编辑。这在保守的戴高乐家族中称得上不同凡响了。她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作品中有两部却别有特色。一部是法国 18 至 19 世纪的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夏多勃里昂的传记。另一本也是传记，写的是 19 世纪爱尔兰政治家达尼埃尔·奥康内尔的

生平。奥康内尔曾致力于争取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解放，为他立传固然同宗教信仰有关，但是传记的主题是把宗教问题同爱国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她也可以说是一个爱尔兰人。于是这本传记也就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不少夏尔·戴高乐传记的作者推测，戴高乐酷爱文学，尤其是夏多勃里昂的诗，而且从小就迷恋于祖国的传统，同母亲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

夏尔的父亲亨利·戴高乐排行第三。老大夏尔毕业研究凯尔特问题，老二朱尔是昆虫学家。亨利走了不同的路，少年时期考进了培训陆军技术人才的巴黎工艺学校。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兰西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亨利应征入伍，在前线负过伤。战争结束后，他弃军从教，在圣玛利亚学校讲授哲学、数学和文学，18岁时和表妹让娜·马约结婚。

亨利和马约都是热忱的爱国者。戴高乐在他的《战争回忆录·召唤》中叙述了对他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说，父亲是个“有见解、有学问和尊重传统”的人，他“对于法国人的尊严充满了感情”。他母亲也对祖国怀着“坚定不移的热爱”，和她对“宗教的虔诚”毫无二致。此外，父亲还使他懂得了法国的历史。亨利·戴高乐夫妇亲身经历过法国近代的普法战争和德雷菲斯事件，母亲曾经向他追忆当时外祖得知巴赞元帅向普鲁士投降后，是怎样伤心地流泪的情景。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说：“这类追述我国以往灾难的故事比任何东西都更激动我的心弦。”

亨利夫妇生了四儿一女。老二就是夏尔·戴高乐，全名叫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他在兄弟当中性

格最倔强，甚至有些刚愎自用，和同伴们一起游戏时总要占上风，压别人一头，既好斗，又好胜。他的大哥格札维埃曾说，戴高乐出生时准是在冰水里泡着的，所以总是那么硬梆梆的。戴高乐和男孩子们时常做打仗的游戏，他们装扮成不同国籍的士兵，但戴高乐总得当统帅，而且是“法国军队”的统帅。有一次，格札维埃说，这一回该换换了。戴高乐断然说：“绝不，我就是要法国！”所有的孩子都得听他的，煞有介事似地真的像两国交兵。一回，小弟皮埃尔被“敌人”俘虏，没有来得及把“情报”吞掉，“情报”给“敌人”搜去了，为此，皮埃尔被狠狠地敲了一顿脑壳。

到了入学年龄，戴高乐进了圣玛利亚学校。教会学校有非常严格的教会传统和纪律，教学要求也很严。戴高乐虽然不如大哥格札维埃那样克勤克俭，但天赋却胜一筹。过目成诵，所以学校成绩是相当出色的。

他最喜欢的功课是文学和历史。全家每年都要到卢瓦尔河别墅去过暑假。亨利在那里置办了一普普通通、但却颇富雅趣的房子，戴高乐的暑期读物总是历史。这也许对他的一生都有影响，他热爱法国，包括法国的历史。他认为法兰西是伟大的民族，有伟大的历史。他在《战争回忆录》中说：“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

童年的戴高乐特别喜欢读法国诗人埃德蒙·罗斯丹的诗剧。10岁那年，父亲带他看了一场罗斯丹的成名作《雏鹰》，留下的印象深极了。拿破仑的独生子流亡到奥地利，奋力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雏鹰”空怀大志，终于没有成功，一直到死都抑郁地怀念着祖国。诗剧的结局悲壮，立意则是

爱国主义的。戴高乐看完诗剧后对父亲说，长大了一定要去当兵。戴高乐一直把“雏鹰”的悲壮结局铭记在心里，几十年后当他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还问起马尔罗，这只小鹰的遗体是否已经移葬在残老军人院拿破仑墓宅里。罗斯丹的另一个诗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是一个三角恋爱悲剧，据说他能从头到尾背下来。

夏尔很喜欢古希的抒情诗，熟读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高乃依、拉辛、夏多勃里昂的作品，喜欢朗读歌德和海涅的诗。他的英语成绩平平，但是并不妨碍他欣赏英国文学。他既敬仰莎士比亚那样的文豪，也喜欢19世纪擅长描写印度风情的吉卜林。有人在他幼年的笔记本里发现他抄下的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话：“每个人都在扼杀自己所喜欢的事物。”

戴高乐15岁时写过一篇题为《德国的战役》的小说。他说：“1930年德国军队向法国宣战！第一支德军，20万之众，携大炮500门沿瑞士边界而下，经过贝尔福特进扰巴黎。第二支德军直接越过群山峻岭，踏向南锡。这支军队有17.5万千人，大炮480门。俾斯麦将军已经命令第三军10人为第二军的后援……”

“1931年1月18日，法国陆军部长从正在维也纳聚会的各国首脑们那里得到了保守中立的诺言。

“在法国，组织工作很快就绪。

“2月10日，各军进入战斗状态。戴高乐很快制定了方案，必须拯救南锡，然后声援布瓦德弗尔。”

这是短篇小说的开头，戴高乐15岁那年在圣玛利亚学校读书时写的。

接着，“戴高乐将军”在小说里调兵遣将，规划了南锡之役，法国士兵如何构筑工事，如何打肉搏战，又如何势如破竹地扑向德军。最有寓意的，是“戴高乐的军队”把德国围困在半个世纪以前法国军队被普鲁士军队打得大败的麦茨，水泄不通的包围圈使敌军无法突围，伤亡惨重。1870年巴赞元帅在麦茨向普鲁士军扯起白旗，在戴高乐的心灵中留下的印象何等深刻。戴高乐是怀着雪耻的心情写这篇小说的。

1906年，戴高乐又写了一个短诗剧，题目叫《苦相逢》。主要情节是：一个羁旅异乡的游客深夜在森林里碰上了强盗，强盗把他身上的全部财物都抢走了，强盗每抢走一件东西，就说：这是最后一件拿走的东西。但总说个没完，一直把异乡人抢个精光。强盗作案的时候，把手枪对着旅客，态度却是十分“谦和”。最后，强盗向这个倒霉的旅客“热情”道别，扬长而去。戴高乐给家人表演过这个诗剧，他扮演那个贪婪而彬彬有礼的强盗。

1908年，戴高乐以夏尔·德·吕卡勒的笔名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和一首诗。短篇小说《扎莱纳》写的是一位派驻新喀里多尼亚的法国青年军官和当地少女扎莱纳的爱情悲剧。这位青年军官由于军纪的约束不得不离开扎莱纳。痴情的扎莱纳痛不欲生，打算用毒药把恋人毒死，自己也同归于尽。但是结果她死了，青年军官却侥幸活了下来，而且一直在法国军队里服役。退休后他怀着无限怅惘的心情回到他青年时期发生罗曼史的小岛。他离开了扎莱纳，却永远怀念着她。

在那首无题诗中，戴高乐抒发了自己准备在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壮烈情怀。

这或许是戴高乐从军以前，也就是考进圣西尔军事学院之前最后的文学作品了。有人说，如果戴高乐选择了文学，也许他会成为一个很有特色的作家。这首诗的文学价值到底怎么样，且不去评论，但是，它反映了步入青年期的戴高乐以身许国的抱负。

哲学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会有比较直接的影响。戴高乐在圣玛利亚学校读书时读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但对他感染力更强的是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柏格森的实证主义哲学。

历史，特别是离当时最近的历史，是青年人最感兴趣的，因为他们可从中了解到最能触动心灵和感情的故事。每日每时发生着的国内外大事，就更能使初谙世事的少年时而神驰，时而激动，时而思索。戴高乐这一代人是在怀着对普鲁士“复仇”的情绪中长大起来的。1871年3月梯也尔屈辱地扯起白旗，法国根据“和约”，被迫把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的一部分割给德国，还缴付50亿法郎的赔款，赔款付清以前必须接受普鲁士军队的占领。从那时起，法国没有一天放松过紧张的神经。为此，法国找到了野心勃勃的俄国，想借助东方的力量牵制压境的强邻。1891年，法国与俄国签订了一项条约，三年后签定了军事协定。议定法国受到德国进攻时，俄国要给予支援，当俄国受攻击时，法国也要给予帮助。法国还指望英国能助一臂之力，不过，英国一贯的作法是置身欧洲大陆之外来纵横捭阖，而且英法在尼罗河地区的利害冲突纠缠不休，所以直到本世纪初英德矛盾加剧、英法矛盾缓解，法国才得以于1903年与英国签订同盟协约。法国、英国、俄国

的反德联盟终于形成了。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迅速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时候，在列强重新分割世界的争斗中，德国的咄咄逼人使法国寝不安席。

戴高乐一落地就遇上了国运颠簸的时代。他4岁那年，发生了德雷菲斯案件，他当然什么也不懂。然而，由于德雷菲斯案件是法国政局尖锐化的集中点，全国上下群情鼎沸，它的余波在法国振荡了相当长的年月。

德雷菲斯案件之后，法国政局出现了一次较大的重新组合：保皇党、教权派和温和的共和派失势，激进党组阁。激进党一方面继续反对教权派等极右派势力，另一方面则大力镇压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

这时也正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向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冶金、电力、汽车、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发展更快。银行资本比工业资本集中更快。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国银行资本的2/3由五家大银行控制着，最大的法兰西银行的200个股东就是200家财政寡头统治集团，他们紧紧扼住法国的经济命脉。这是一种“金融寡头”，是一种“绝对的垄断”，“事实上这是‘大银行托拉斯’”。金融寡头使战前法国的资本输出仅次于英国，国外投资总额从1902年的300多亿法郎增至1914年的600亿法郎。金融垄断资本家发行巨额有价证券，从中获得垄断利润，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高利贷者”、“金融君主国”，“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了报刊，又控制着政府”。

随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发展，阶级矛盾陡然尖锐起来，工人运动不断高涨，1911年平均每天发

生四起罢工，1905—1911年，参加罢工的人平均每年达13万人之多。

到90年代末，法国统治阶级更加紧张地参加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势力范围的角逐和斗争，积极扩军备战，军队增加到60万人，比普法战争结束时增加了1/3。殖民地马上就要分割完毕，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世界战争酝酿成熟了，同盟国集团和协约国集团都红着眼睛窥伺、等待着一个引爆的契机，战争的阴霾在欧洲上空徘徊。这一切，对于戴高乐漫长的一生是不可磨灭的启蒙。

戴高乐十多岁时下决心进圣西尔军事学院，梦寐以求地要当军人。传说14岁那年，一天，戴高乐家有人来，随即从门缝里递进一张“费德尔布将军”的名片，门外站着的竟是身着戎装扮成费德尔布将军的戴高乐。费德尔布将军是普法战争期间的法国指挥官，据说他率领的军队从没有打过败仗。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打了败仗，而费德尔布却成了“英雄”。装扮成这位“常胜将军”的模样玩耍，与戴高乐矢志从军的抱负是契合的。

1907年，圣玛利亚学校由于激进党政府反教权政策而关闭，戴高乐的父亲便把他送到以成绩闻名的比利时安托万中学就读，因为考圣西尔，数学成绩必须出色。戴高乐一心要考入军校，所以再不像幼年时那样不求甚解，在安托万中学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一年后他转学进入巴黎的斯塔尼斯拉斯学校。

1909年8月，戴高乐通过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他的分数不算高，在212名当中是第111名，但总算考

取了，同年10月，成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学员。这一年，他正19岁。

进入军事学院，这是戴高乐一生的转折点。这一选择，决定了戴高乐将来不会成为文学家，也不会成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文史哲方面的基础是牢固的，这对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是很重要的。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戴高乐的著作不仅文字流畅生动，而且反映出他具有十分渊博的学识。

戴高乐回忆说：“当我参加陆军时，我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队伍之一。”

进入圣西尔就等于跨进了陆军的大门。根据新规定，新生入校前要先当一年兵。据说，过去录取的年轻军官一旦进入了这座培养军事指挥员的圣殿，便自我陶醉起来，丝毫不体会当军人的甘苦，所以便订出了这条新规定。戴高乐被安排在驻阿拉斯城的陆军第三十三步兵团第九连当见习军官。他很不喜欢这一年的生活，认为整天干许多繁琐的力气活对于培养军事人才来说简直是浪费时间。他在家信中说，他满可以给整个营的指挥官们讲课了，但现在却只干些挑水、烧饭的琐事。一天有人问戴高乐所属连队的连长德·蒂尼上尉，为什么不提拔这个精明强干的新兵，回答是：“让这样的青年人当中士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他只有当上总司令，才会满意的。”

1910年10月，见习期满，戴高乐正式进入圣西尔。他在同辈当中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他坚毅果敢，但孤高自傲，让人觉得他落落寡言，同他的高身材、大鼻子，恰好互为表里。

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些绰号，如“公鸡”、“两米”等等。同学们也没有放过他那个特别显眼的“大鼻子”。有一次开联欢会，同学们提议戴高乐背诵他最喜欢的罗斯丹诗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他立刻爬上桌子，高声朗诵了诗剧主人公西哈诺关于自己的“大鼻子”一段台词，于是，“大鼻子”的雅号便转赠给了戴高乐。

戴高乐在圣西尔勤奋地学习了两年，于1912年10月1日毕业，在毕业考试中取得第十三名，军衔是少尉。填写分配志愿时，戴高乐仍然选择了第三十三步兵团，回到了阿拉斯。这时兵团的团长是菲利普·贝当上校。

菲利普·贝当在法国现代史中曾赢得很高的荣誉，在有名的凡尔登战役中，贝当率领法国军队重挫德军，因而被赞为“英雄”。但贝当在垂暮之年却招来唾骂，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充当了维希傀儡政府的首脑。胜利后以民族叛逆罪判处死刑。

在第三十三步兵团，贝当很赏识戴高乐的才干。相传，戴高乐曾经受过贝当的处罚。一次贝当视察部队，戴高乐统率的一部分队伍在穿过阿拉斯返回营地时乱了套，一时间把交通堵塞了，贝当以为这是戴高乐指挥失当，便罚他坐禁闭，旋即发现并不是戴高乐的过错便收回了处分的命令。第二天是星期日，贝当正要到巴黎去度周末，当他刚走进火车车厢，戴高乐也紧接着跳进了同一节车厢，他是一接到取消处分的命令就急忙赶到火车站来的。贝当说：“你还要过周末么？”戴高乐回答说：“是的，上校。”“但是，刚才你还在坐禁闭呢。”“不错，可是，既然处分是不公平的，我就有把握你会撤销它

的。”于是，他们一路同行。

1913年10月1日，戴高乐晋升为陆军中尉。贝当写下的评语是：“异常聪颖，忠于职守……极堪嘉许。”

戴高乐进入圣西尔的第二年爆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法国于5月占领摩洛哥首都菲斯，7月德“豹号”炮舰开进摩洛哥的阿格的尔港，“柏林号”巡洋舰也出现在摩洛哥海面。德法冲突一触即发。英国支持法国，德国被迫与法国谈判，最后，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势力范围，法国则把法属刚果的一部分割让给德国。

摩洛哥危机尚未结束，意大利和土耳其为争夺的黎波里于1911年发生战争。意土战争加速了巴尔干危机，诱发了1912年和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各帝国主义摩拳擦掌加紧备战。到1913年，德国的现役兵为76万人；英国的现役兵为41万人；法国的现役兵增至77万人；沙皇俄国的现役兵为130万人。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的军队以塞尔维亚和蒙特内格罗为假想敌，在波斯尼亚举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亲自指挥演习的奥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于6月28日到达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爱国者炸死。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7天之内，法国、英国和俄国等协约国集团都卷入了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等同盟国集团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爆发了。对法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从德国手中夺取阿尔萨斯和洛林失地、取得萨尔煤矿区权益、恢复在欧洲的霸权地位的大好时机。

法国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进攻比利时。第三十三步兵团

受命于8月5日从阿拉斯启程，开赴比利时。戴高乐踌躇满志，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每个人都动员起来了。这种强压着的激情是我梦寐以求的。”

第三十三步兵团本属于后备力量。但由于德国攻势极猛，法军退至横贯迪南的莫斯河上，第三十三步兵团奉命守住莫斯河大桥，阻止德军过河。8月15日，与德军交火，戴高乐在他参加的第一次实战时大腿负伤，先后被送到阿拉斯、里昂和巴黎治疗，年底又重返前线。

这时他所属的步兵团已开往捍巴尼，贝当已经调离三十三团并提升为旅长。新团长是克罗戴尔上校。戴高乐离开战场的三个月期间，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海峡到瑞士一线，交战双方一直在顶牛。戴高乐执行了许多次很危险的侦察任务，表现出色。1915年1月20日，戴高乐受到表彰。后来在另一位新团长布多尔上校任期时，他被提升为上尉。

1915年底，战争僵局有了突破，德国军开始向凡尔登大举进攻。法国军队面临严峻考验。支持凡尔登防务的是第三十三步兵团的前团长、后晋升为将军的贝当。1916年2月，戴高乐所在部队向凡尔登集结，3月1日与德军在都蒙堡一带遭遇。遭遇战打得十分激烈，德军猛烈炮击法军阵地，第三十三步兵团的大部分阵地损失严重，当时传说戴高乐已经阵亡。贝当为此还发布了正式的表彰令：“戴高乐上尉，连指挥员，以其德智殊勋于世；于其所属营以遭敌猛烈炮击而伤亡惨重、且敌人以强兵进逼之际，率部迅猛出击，拼力与敌肉搏——实为完遂其军人荣誉感之唯一抉择。上尉卒殉难沙场，诚我无双之军士也。”

其实，戴高乐并没有死，而是受了重伤，在昏迷中被德军俘虏了。他曾经设法越狱，没有成功，被送到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惩罚营。戴高乐怀着雄心壮志，却没有能够在战场上充分施展他的才干，过了两年零八个月，俘虏生活，可算是“壮志未酬”。然而，他并没有虚度在俘虏营的时间，他作了大量的笔记，把对战略方面的心得体会记了下来。为他的第一部政治、军事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积累了基础材料。这些笔记，连同他在狱中写回的家信，成为后人研究戴高乐青年时期的思想、性格和抱负的有价值的资料。他在笔记中写道：“一个人必须要作一个有志气的人。行动的成功之道是能够在任何时候自我控制。更确切地说，这是取得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领袖人物是不尚空谈的人。”青年戴高乐立志弥高，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失作为一个领袖人物的抱负。在俘虏营里，戴高乐每天阅读德文报纸，从中了解战争的进程；他在和难友们讨论有关战争问题时候表现出胜利的信心，难友们给他起个绰号：“王室大元帅”，意思是历代王朝统率陆军的总司令。

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宣布投降，11日德国军队放下了武器，德方代表前往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在法国福煦将军的行军火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戴高乐也从德国的俘虏营获释回国。

戴高乐在四年对德战争当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俘虏营中度过的，对于戴高乐这个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来说未免是件憾事。不过他在都奥蒙堡战役当中确曾表现得十分出色，布多尔上校竭力为他请功，于是1919年7月他获得了一

枚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次年春天，戴高乐随法国军事代表团到了波兰。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有史以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为了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未经宣战即对苏维埃俄国开始了武装干涉。波兰同俄国也处于交战状态。

1919年4月，波兰军队开进白俄罗斯。

戴高乐初到波兰被派到波兰朗伯尔托夫军官训练学校担任教官，讲授战术学。不久德国驻波军事代表团卷进了俄波战争，戴高乐和波兰第五轻步兵团一起参加了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

俄波战争断断续续进行到1921年3月才结束。戴高乐奉调回国。这一年的4月7日，戴高乐和伊冯娜·旺德鲁在中莱地区圣母院举行了结婚仪式。

戴高乐和伊冯娜·旺德鲁的结识是在两年前的10月，伊冯娜比戴高乐小10岁，只有19岁。旺德鲁一家世代居住在法国北方加莱地区，是饼干制造商，也是天主教家庭。戴高乐和伊冯娜相识还是经过了媒妁之言的，不过却一见钟情，成为终生伴侣，直到白头偕老。那时由于戴高乐正在波兰服役，所以直到一年后才正式订婚。婚后，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儿子菲利浦，女儿伊丽莎白和安娜。

1921年10月1日起，戴高乐接到调令，到圣西尔军事学院担任战争史教员。不过，戴高乐不满足于只在军事院校里

当教员，他的心愿是进入高等军事学院深造，将来成为一名在战争中运筹帷幄的高级将领。果然，第二年11月，他考进了高等军事学院。

在两年的进修期间，戴高乐根据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实战经验，愈来愈明了一种战术思想，他认为未来的战争必定是机械化的战争，特点将是倚靠高度机动的地面部队主动进攻，而不是消极防御，所以应该发展坦克部队，提高部队的机械化程度和素质。戴高乐在1924年6月作为结业考核的实地演习中实践了他的以主动进攻为基点的战术理论。戴高乐的战术思想与院长穆瓦朗和副院长迪菲厄传统的消极防御理论是针锋相对的，所以虽然迪菲厄主持下的考试委员会的委员们对戴高乐的评价不低，但是毕业考试的评定却是“良好”，由院长签署的成绩单所附的评语中，虽然肯定了戴高乐的成绩和长处，但也指出他过于自信，好作犯上之举，俨然是个“国王”。

戴高乐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在总参谋部所属的运输供给局工作了几个月，随后被调任美因兹的莱因区法军司令部。这一年，戴高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这是根据他被俘期间在狱中的笔记整理而成的。戴高乐在书中提出了一个他一生奉为宗旨的信条——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民族和国家，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此时，戴高乐已经34岁了，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在事业上不算顺利。然而他的大法兰西民族主义思想却根深蒂固地确立起来了。尤其是法德之间的纠纷、对立、冲突、战争……在戴高乐的意识中铭刻得那样地深，那样地牢，以致在处理同德国的关

系问题时，法兰西前途和命运占据着头等重要的位置。戴高乐心有余悸地谈论德意志民族具有扎拉图斯拉心目中的“超人性格”。他确信，法兰西民族意识从古到今都注定要迎接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挑战。

1925年10月，法军总监和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的贝当元帅委任戴高乐为他的幕僚。戴高乐时来运转的时机到了。他的才干和主张得到了贝当的赞许和赏识。1927年，当了12年上尉的戴高乐被提升为少校，受令统率第十九轻步兵营，在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驻防。这一年的4月，戴高乐在贝当的亲自陪同下在高等军事学院作了三次演讲，已届中年的戴高乐第一次享受到这种殊荣。三次讲座的题目分别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领袖人物的性格》和《威望》。后来他在巴黎大学也宣讲过这三个演讲。这三次的讲演稿以及后来他加写的《主义论》和《政治与军人》，合编为《剑刃》。戴高乐正在按照领袖人物的标准塑造自己。看来，戴高乐并不满足于单单是个军官。

两年后，戴高乐离开莱因区，奉调到贝鲁特，在驻在这个地区的法国部队里供职。从1929年年底到1931年回国前，他到过开罗、巴格达、大巴士革和耶路撒冷。

1931年底戴高乐从中东回国后，到贝当主持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两年后提升为中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十多年中，戴高乐调动过好几次驻防地点，此后六七年内他相对稳定在军界首脑部门进行军事战略方面的研究工作，直到1937年底他晋升为上校的同时，被任命为驻麦茨的第五〇七坦克团团长，才又回到军事指挥的职能岗位。

戴高乐来到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根据战时的需要对建立防务体系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之一是发表在1934年1月1日的《法兰西军事评论》上的论文《海外的经济动员》。更重要的要数四个月后发表的专著《关于职业军》，这是戴高乐的第三本著作，是一本阐述军事思想的著作。早在圣西尔军事学院的时候，戴高乐就孕育着一种想法，即未来的战争将是快速的机械化战争。经过战争实践，他愈来愈相信这将是战争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或许可以说，《关于职业军》就是沿着这条思路写成的。戴高乐认为，在战争条件下，法国的地形是很不利的，尤其是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更加脆弱。英国和美国可以依靠海洋，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作为屏障。法国首都巴黎周围却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带，无险可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构筑再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调遣的机动力量，也就是说，“一批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使用武器的队伍”。而且必须在陆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选的人员”。他认为，全部现役人员应当在10万人左右，由常备军组成，他们应在精锐部队中服役六年，掌握专门技术，培养进取精神和集体精神，并且在指挥艺术方面也要有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机械化战争的瞬息万变的局势，所以必须发展无线电通讯系统。

这些主张在当时是积极主动的进攻战略思想。在当时法国的军界、政界中认识并不一致。马奇诺的神话还有市场。戴高乐军衔不算高，人微言轻，支持者不多，执政者当中支持他的就更少了。

戴高乐关于机械化战争的思想虽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但这个时期却是他趋于成熟的时期，对于他在1958年以后提出的独立核防务政策，都是有影响的。

戴高乐在进行军事理论的探讨和争论的时候，欧洲局势正酝酿着危机。

1930年9月14日，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一跃成为德国第一大党，从过去的12席增为107席，1932年增为230席，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德国法西斯势力迅速摆脱了《凡尔赛和约》、《洛迦诺公约》和《凯洛洛—白里安公约》等种种条约的束缚，积极扩充军备。同年10月，德国宣布退出裁军大会，随后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1935年3月16日，德国正式废除《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军备的条款，重新实行“征兵制”，宣布德国陆军将增至36个师。一年后，德国废除了《洛迦诺公约》，重新占领莱茵区。希特勒密锣紧鼓地在战争的道路上疾驰。

这几年，戴高乐为建立机械化常备军大声疾呼。他认为事情是那样明白如昼：德国从希特勒上台以来一步紧似一步地扩军备战，一旦羽翼丰满，就会首先扑向法国。但是，当德国正在迅速建立起自己的装甲部队和强大的空军时，法国的军政要人们却迷恋着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的神话。“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麻痹状态，当局竟然从不号召采取必要行动。”戴高乐的主张虽然得到了新闻界某些人的支持，《巴黎日报》、《时代报》等发表过不少文章，宣传建立机械化特种兵团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提醒人们：德国的主要军备力量是为了进攻。但是，这类纸上谈兵，不足以影响当

局的决策。戴高乐深知自己不过是一个中级军官，成不了气候，他决心设法影响担负国防责任的政府。

1934年12月5日，戴高乐经人介绍，认识了前财政部长、当时是国民议会议员的保罗·雷诺。他向雷诺介绍了他关于建立机械化常备军的观点。雷诺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并且在1935年3月15日在议会辩论国防问题时提出：法国必须建立素质极高的机械化特种兵团，其中包括六个第一线师，一个轻装备师、总后备队和后勤部队等。雷诺建议这些由正规军组成的机械化部队至迟应在1940年4月15日以前实现。

戴高乐的主张终于从国防委员会同仁之间的议论和报界的宣传跨进议会论坛中去了。戴高乐从结识雷诺那一天起，就不断向后者提供有关德军的情况以及他本人建立机械化部队的细节。国民议会举行辩论的头一天，戴高乐给雷诺写信，敦促他利用自己的“权威性”，不失时机地“为国家提出这项军事上的新政策”。议会辩论的第二天，戴高乐又写信，对雷诺在议会上“唯一具有逻辑性和威力”的讲话表示“极为热烈的祝贺”。到1938年参加达拉第内阁出任司法部长以前，雷诺在议会里一直为戴高乐的主张鼓吹、宣传，并且写了一本《论法国的军事问题》的书和不少文章。在那几年里，雷诺是戴高乐的支持者。

作为一个职业军官，戴高乐一刻不停地关注着德国的动向。他在给雷诺的一封信中写道：“对于德国军队的最近扩张，你肯定不会感到意外。在一场可称为军备的竞争的赌博中，有两盘棋摆在那里：规模和质量！我们已输掉了第一盘，因为

我们没有达到的能力；也输掉了第二盘，因为我们没有达到的愿望。”“为了实行一项新的军事政策，法国不能再延误时日了。”

戴高乐对人民阵线政府的军事政策曾经既抱有期望，又感到极不满足。例如，政府决定拿出 140 亿法郎在四年内实行军队的机械化，增加现役军人数量。但是对彻底改善“法国安全的条件”，却仍然没有明确的观念，而且动作太慢，规模也太小，所以政府的计划仍不足以改变法军孱弱的现状。但是，政府采取的措施毕竟是一个进步，“但愿希特勒留给我们时间！”

戴高乐根本不能放心。勃卢姆总理在组织政府以前也曾参加过关于建立特种兵团的笔战。那是在 1934 年 11—12 月间，勃卢姆在《人民报》上接连发表文章，有几篇文章的题目是：《职业士兵与职业军队》、《争取职业军队？》、《打倒职业军队！》。毋须多说，勃卢姆是戴高乐的对立面。

1936 年 10 月，总理勃卢姆根据梅耶上校的建议总算接见了戴高乐。这次会晤，没有给戴高乐什么鼓舞，相反，他感到勃卢姆并没有制定一项对抗德国的积极政策。在谈话中，戴高乐提到，如果德国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法国就应该出兵鲁尔区。法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德国的侵略行动就会被制止住。为此需要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的装甲兵团。戴高乐说，政府计划要制造的飞机是用于截击、而不是用于进攻的，坦克设计也远远不能适应完整独立作战体系的需要。戴高乐滔滔不绝地说，勃卢姆却没有心思认真地听；谈话时，电话铃足响了十来次，他的注意力“被分散到琐屑的

议会和行政事务上去了”。当戴高乐告别的时候，勃卢姆做了一个疲惫不堪的手势说：“瞧，一个当政府首脑的人，根本没有五分钟能停留在同一个想法上，要坚持你所提出的计划，谈何容易！”

这一年的12月20日，戴高乐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希特勒怎么能够让法国享有阿尔萨斯和自己的殖民地呢？如今一切都应该服从一个计划，就是把所有反对德国的人团结起来，制止它发动战争；如果它发动战争，便战胜它。即使谈判，也绝不能像拿破仑第三相信俾斯麦那样轻信。”

英国的张伯伦和法国的达拉第正在和希特勒、墨索里尼酝酿一场玩弄欧洲命运的交易。1938年3月，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为德国向多瑙河流域扩张铺平道路。9月29日，希特勒、里宾特罗甫、墨索里尼、齐亚诺、张伯伦、达拉第举行会谈，签订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和通向战争的《慕尼黑协定》。希特勒的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捷克军队撤离苏台德区。捷克政府被迫默认这项规定。于是，德国确立了在中欧的霸权，德军先占领苏台德区，几个月后并吞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1938年的圣诞节，12月26日，戴高乐给他的好友奥伯坦的信中写道：“我们将面临一个十分动荡的1939年，如果不是腥风血雨的话。”

德国法西斯吞并捷克后立即把矛头指向波兰。9月1日。德国从陆地和空中进攻波兰，装甲部队跨过波兰边界。9月3日，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德军踏进波兰领土的第二天，戴高乐被任命为第五军团

装甲兵司令。9月8日，戴高乐写信给妹妹玛莉·阿格奈斯和弟弟阿尔弗莱德，向全家辞行，“我已赴命去指挥阿尔萨斯的装甲部队。”

戴高乐能阻挡住德国军队么？作为一个职业军官，戴高乐愿实现他万死不辞的天职，为国家和民族效命，但他并不掌握整个军队的指挥权。戴高乐感到，法国在位的军政要人“仍抱有不会打到底的幻想”。据报道：“西线战事开始于本月3日，至今已有30日。但是不幸，虽然能解东线波兰之围的只有西线，直至今日，我们还看不出西线有任何超过前哨战的战斗。众所周知，这一带战事发生在摩塞河和萨尔区之间，法军主要的进击对象是萨尔布品肯。直至现在，萨尔布品肯的被占领之说，亦还是问题，从军事观点上，我们可以说，实质上：‘西线尚无战事！’”

第二章 次长——主席

戴高乐于1940年9月2日受命赴任，赶到阿尔萨斯指挥驻扎在那里的装甲部队。时局正急转直下。德国军队于9月29日兼并了但泽自由市和东普鲁士与西里西亚之间的大片波兰领土。

1940年4月，德军登陆挪威，迅速进入奥斯陆等重要城市，开进丹麦。5月10日，德军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英派出的部队虽然同比利时军队一起进行了抵抗，但德军仍攻下比利时防御要冲埃邦—埃马厄尔要塞。12日德军在色当越过了马斯河。

比利时和荷兰的失陷使大约二三十万英国远征军暴露在敌人面前，被压迫在海峡一带，英国政府为了保存实力，组织了举世闻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德军放手进攻法国，6月5日开始向色当到阿尔维尔这条弧形线上的法国军队猛攻。10日，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从南方侵入法国。15日，要塞凡尔登失陷。17日，法国政府要求停战。22日，停战协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元帅、盟军司令福煦将军接受德皇降表的地方——巴黎附近的贡比涅签字。根据协定，法军解除武装，3/5的国土沦于敌手。法国旋即组成了维希傀儡政府，曾经与戴高乐有过师友之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英雄”——

贝当，以耄耋之年当了通敌的法奸。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期间，法国政局发生了急剧而带有戏剧性的变化。在《慕尼黑规定》上签字的达拉第无法控制局面，早于1940年3月20日辞职。财政部长保罗·雷诺出场组织政府。在这个紧要关头这是一种变通之计。因为雷诺是一个“主战派”，换上一个对德持强硬态度的政治家，也许可以收到稳定人心的效果。戴高乐立即给雷诺写信，一则表示祝贺，更重要的是希望雷诺能使被绥靖主义者搞得士气颓唐的法国军队振作起来；利用他本人的权威，把机械化特种部队加速组织起来。雷诺也没有忘记戴高乐。因为在头几个月，戴高乐还曾同雷诺议论过时局，并写了备忘录，向政府80位军政要人再次陈述，从空中和陆地两个方面加强机械化部队建设的意见。因此，雷诺组阁后便想到戴高乐，本打算任命戴高乐担任军事方面的副国务秘书。

雷诺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虽然当了总理，国防部长仍是达拉第，后者坚决反对起用戴高乐，而且政府内外绥靖势力还占着优势，消极防御派还在军队里占着上风，前任和现任总参谋长甘末林、魏刚都是戴高乐的反对者。达拉第要挟雷诺说，与其让戴高乐当副国务秘书，还不如他本人让出国防部长的位子。雷诺感到如果硬要任用戴高乐，达拉第的激进社会党就可能拆自己的台。雷诺企图“在这种毒化了的空气”中树立权威，势必得和达拉第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雷诺收回了未正式颁布的任命。戴高乐只好暂不离开他的阿尔萨斯装甲阵地前线，随即任第四装甲师的司令。

戴高乐心情沉重，4月14日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正如您

所看到的，我已经回到了前线。当我回来的时候，巴黎的政治空气太恶劣了，保罗·雷诺和达拉第之间的关系太紧张了，因此我无法有效地进行工作。我要求总理允许我仍回到装甲部队去，等待局势明朗的时候再说。他答应了，同时向我表示他不久就会再把我叫回来。所以，我等待着，并不着急。”

雷诺政府的情况实在不妙。与达拉第、魏刚等纠合为一股绥靖势力的贝当，从驻西班牙大使调任内阁副总理。此时的贝当，已堕落为彻底的失败主义者、十足的投降派。雷诺在6月4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已开始大举向法国进攻时，终于任命50岁的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这是他首次担任政府职务。

危急之秋受命的戴高乐认为，必须寻求通过抵抗挽救危亡的道路。在争取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和声援的同时，制订在北非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长期计划。戴高乐感到，雷诺的心思有些捉摸不一，他能够坚持下去么？为了争取英国的支持，戴高乐决定带着雷诺的指示，亲自去伦敦会见丘吉尔。

英法对德宣战以来，法国似乎只有英国一个盟友。美国在欧洲战场以外观望。法国虽然与苏联缔结了同盟条约，但是苏联和德国也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

希特勒进军波兰以后没有直接扑向法国，而是向北迂回，解决了丹麦和挪威后再南下。但是，色当失陷、英军从敦刻尔克撤走、意大利从南境逼来，法国也就处在北、东、南三面包围之中了。马奇诺的神话像肥皂泡一样，成为嘲讽的对象。

局势要求法、英更加密切地配合。1940年4月4日，丘

吉尔受命负责英国的防御计划。5月10日，张伯伦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丘吉尔出任首相，组织了保守党和工党的战时联合政府。丘吉尔在巴黎沦陷前亲自三次飞往法国，参加英法联席军事会议。

丘吉尔的几次会谈对话人都是雷诺、魏刚等一班人。大家都预感到法国的沦亡是不可避免的。魏刚26日表示，政府只有束手就擒一条路了。色当败绩使这位将军彻底解除了精神武装。新任副总理的贝当同魏刚的精神状态毫无二致。丘吉尔心情极不平静，如果法国沦于敌手，英吉利海峡仅一水之隔，孤悬海上的英伦三岛岂不是更危险了么！丘吉尔和他的联合政府成员艾德礼、哈利法克斯以及留驻法国的英国将领斯皮尔斯将军，都发觉法国的军政要人深陷在失败主义情绪中，在“战”与“和”的搏斗中一步一步地向乞降的方向迈步。特别是在5月26日和31日的两次谈话中，雷诺心情沉重地、吞吞吐吐地表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法国也许不得不走和谈一途。会谈时丘吉尔答应，只要法国决心打下去，英国愿意考虑以空军部队助战，但是他对雷诺政府有无决心，感到没有把握。

雷诺毕竟与贝当、魏刚等人不同，在绝望之余还打算再作一次努力，为了争取英国的信任，雷诺6月8日决定派新任命为国防部次长的戴高乐去伦敦面见丘吉尔，告诉他法国政府把戴高乐这样的坚定主战派提升，并作为管理国防事宜的国防部高级官员，就表明了打下去的决心。

戴高乐在动身前去见魏刚，发现他“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

戴高乐马上把谈话内容告诉了雷诺，建议撤去魏刚总参谋长的职务，但雷诺感到难于下这个决心。

6月9日，戴高乐飞往伦敦。丘吉尔很快在唐宁街10号接见了戴高乐。这是他们第一次直接晤面。会见后，戴高乐对丘吉尔的“第一个印象”是好的。但是在涉及问题本身时，丘吉尔并没有满足法国的要求，因为丘吉尔断定法国是输定了，法国本土不可能重建防线，所以他断然拒绝派空军支援，只同意把曾在比利时作战残存下来的部队留下来。

戴高乐对此行的印象是：“伦敦与巴黎之间战略上的配合实际上已经垮台了。这次大陆形势的逆转，就足以使英国只管自己的防务了。”

戴高乐从英国回来后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视事了，先迁往图尔，然后又迁往波尔多。时局进一步恶化，投降派更加紧锣密鼓地活动。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尔来到图尔，他只能作一番道义上支持的姿态，雷诺神情颓然，魏刚当着丘吉尔的面向雷诺报告：法军已经精疲力尽，全线摧枯拉朽般地垮了，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因此除请求停战之外别无它途。法国政府乱作一团。

丘吉尔则希望法国倚靠海军力量坚持在南方作战，甚至在北非作战，不赞成法国与德国单独签订和约。英国方面则坚决为粉碎希特勒主义而奋战，英国可以坚持到底；当英国赢得战争的时候，法国也将恢复其尊严和伟大。丘吉尔这次来法国还有一个目的：说服法国，当一定要停战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军舰落在德国人手里。

当丘吉尔离开会议厅、穿过通向庭院的过厅时，看见戴

高乐冷峻地、毫无表情地站在门口。在相互致意后，丘吉尔用法语低声地念叨了一声：“应运而生的人”，便匆匆离去。

在战与降搏斗的最后关头，在贝当取代雷诺以前，戴高乐一直尽最大的努力，紧张地筹措着把抗战指挥中心、作战的人力和物资转移到北非去。为此，首先要挫败投降派的阴谋，只有这样，法国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动撤离，继续坚持抗战。然而投降派的势力太大，雷诺能坚持多久呢？戴高乐深知阻力极大，但仍然于6月12日带着移师北非的计划来见雷诺。此时，德国军队已经渡过塞纳河，巴黎的失陷在旦夕之间，雷诺决定把政府迁往波尔多。贝当、魏刚等包围了雷诺，反对一切移师北非的抗德方案。海军上将达尔朗曾经表示要打到底，但是当戴高乐敦促他无论如何不能使法国舰队落在德人手里的时候，达尔朗却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子，听从了魏刚的命令。国务部长让·伊巴尔内加莱也曾经是少数主战派当中的一个，但事到临头却说：“作为一个老军人来讲，除服从我的上司贝当、魏刚元帅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我的看法了。”丘吉尔正是看到法国局势垂危，所以匆忙赶到法国，向雷诺提出不能将舰队落入敌手。如果英国连对法国舰队也不能指望，那么法国对英国还有多大用处呢？不出所料，巴黎于14日被占领，戴高乐向雷诺建议，为了摆脱失败主义者的包围，挽救危亡局势，必须把政府迁往阿尔及尔，在那里领导反抗希特勒的战争。但是被投降派包围的雷诺，纵使心有余，但力已不足了。16日召开了内阁会议，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会议。

戴高乐在取得雷诺的同意后立即动身去伦敦，要求英国

协助解决政府迁往北非的运输问题。

16日黎明时分，戴高乐到达伦敦。法国驻英大使科尔班和法英战争物资委员会法方主席让·莫内来见戴高乐。他们两人认为，在当前这种紧要关头把雷诺政府稳住，并争取雷诺去阿尔及尔，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他们和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罗伯特·凡希塔想出了一个给雷诺注射强心剂的办法：由英国政府出面提议，实行英法两国更广泛的联盟，组成一个相当于政府的联合机构共同管理资源。这样或许起码可以拖延法国投降的时间，也可以为北非抗战计划争取较多的时日。科尔班、让·莫内和戴高乐商定后，决定由戴高乐当面向丘吉尔提出。

对于这类不同民族国家联成一体计划，戴高乐从根本上是不赞成的，况且这种大规模的联盟是很不现实的。但是他也觉得，如果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由英方向雷诺政府提出这个倡议，可以对雷诺起一些精神上的刺激和鼓励作用，可以多少牵制一下投降派的阴谋。于是，戴高乐在取得英国政府同意在运输方面协助法国军队撤往北非之后，便提到了英法联盟的想法。丘吉尔已从哈利法克斯那里知道了这个建议，同意马上召开内阁会议加以讨论。英国政府原已打算默许法国单独讲和，条件是法国舰队必须驶往英国港口。电文已经起草好了，丘吉尔决定先压一压，他以为英法联盟的提议会使病入膏肓的雷诺政府出现片刻的回光返照。

英国内阁开会的时候，戴高乐给雷诺打了电话，说当天晚上将有重要消息通知他，请他务必不要使法国内阁会议轻易作出谈和的决定。雷诺回答说，他可以把内阁会议至迟推

到下午 5 时。

戴高乐给雷诺通电话两小时后，丘吉尔兴冲冲地火速告诉他，英国内阁已同意了英法联盟的计划。戴高乐立刻再打电话把联盟的宣言草稿念给雷诺听。丘吉尔从戴高乐手里接过话筒，直接对雷诺说，他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关于组成英法联盟的文件。这时法国的内阁会议还没有举行。

戴高乐立即乘英方提供的飞机返回波尔多，丘吉尔也准备乘驱逐舰到康加诺去同雷诺会晤。戴高乐和邱吉尔都竭力设法以英法联盟的方案，把法国引上抗战的道路。

当晚 9 时半，戴高乐在波尔多机场着陆。前来迎接戴高乐的助手颓丧地告诉他：内阁会议开过了，大局无可挽回，雷诺政府已经辞职，菲利浦·贝当受命组织政府，第二天即向德国乞和。

戴高乐看到大势已去，决定马上离开法国。他决心战斗下去，但是法国本土根本无法立足了。戴高乐两天前在伦敦时已经为救国图存的大业作了一件大事，即以国防部次长的名义命令预定驶向波尔多的“巴士德号”轮船，改变航向，驶向英国港口。这是他最后一次行使国防部次长的职权。船上载有 1000 门 75 毫米美国大炮、数千挺机枪和大量弹药。

6 月 17 日上午 9 时，戴高乐偕妻子女儿，飞往伦敦。“在这架小飞机上戴高乐携带着法国的荣誉，”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回忆说：“我感到自己是单独一个人，一切都被剥夺了，就像一个人面对着一片茫茫的大海，准备跳到水里游过去。”“我已经年近半百，又开始了冒险生涯，就像一个人被命运抛出来，失掉了一切依靠一样。”

戴高乐抵达伦敦后向法国国防部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大致说：“我现已在伦敦。昨日曾根据保罗·雷诺先生的指示，与英国国防部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磋商：一、一切由美国政府向盟国提供的军备物资均将储存在英国领土，这不影响已经协义的或即将协议的分配方案；二、目前在法国的德国战俘将在波尔多移交给英国军事当局……”“关于英方就法国和北非间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提供援助问题，我已经向英方要求从6月19日起在三周内援助50万吨吨位的轮船。”“我现在处于无权地位。我应否继续磋商？听候径由使馆或合作代表团转达的命令”

贝当政府既已投降，当然不会再委任戴高乐去办有关抗敌的事情，戴高乐接到的复电是召他回国的“命令”。戴高乐立即给魏刚复信说，只要不投降，那他戴高乐“愿意参加可能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国抵抗力量，无论在什么地方”。6月30日，贝当政府又发了一道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自首”，听任“战争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先是判处戴高乐四年徒刑，后来根据当了伪政权国防部长魏刚的指示又加了刑，改判戴高乐“死刑”。

戴高乐到达伦敦后立即同丘吉尔会晤，戴高乐提出：只要贝当一公开宣布投降，他就通过英国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告：自由的法兰西将继续战斗。于是，6月18日下午6时戴高乐坐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向全世界，也向沦亡的法国，发表了有历史意义的“六·一八”演说。戴高乐宣告：

“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后盾。它可以与控制着海洋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同盟，也可

以像英国一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

他号召：

“我，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火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他指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就这样，戴高乐在海峡彼岸的伦敦树起了第一面法国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旗帜。

戴高乐在当时的名声并不显赫，他无非是一名任职不足20天的国防部次长而已。但他决心在海外把所有和他一起战斗的人团聚在一个以他为首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里。

戴高乐首先把眼睛转向法国在亚非殖民地的总督。他认为，既然要在广漠的海外把抵抗斗争坚持下去，就非取得总督们的合作不可，其中最重要的是北非，因为法国在北非的总督态度将影响法国在非洲各地的军政领导人的态度。6月19日和24日戴高乐两次给法国驻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斯将军发了电报，表示：如果他拒绝向德国投降，戴高乐宁愿服从他的指挥，一起抗战。诺盖斯表示要继续抗德，但不久就背弃诺言，服从了伪政权的命令。

戴高乐也向其他地区的法国总督呼吁，除了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乔治·卡特鲁将军之外，一时还没有人作出反响。戴高乐决定亲自去非洲各地游说。

戴高乐的事业，在开始时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持来自英国。

美国政府虽然答应给欧洲的反抗希特勒的斗争以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但是在法国局势最令人担心的日子里，美国使节仍留在法国本土，苏联和加拿大等国也有大使在那里，而英国政府 6 月 23 日就发表了公告：不再承认贝当“政府”是法国的政府。6 月 28 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告：英国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为前来投奔戴高乐的人员提供方便。虽然，英国的支持是为了自身利益，但对于势单力孤的戴高乐来说已非同小可。

6 月 30 日，海军中将爱米尔·米塞利埃来到伦敦，表示支持戴高乐。同时在利物浦附近驻扎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内服役的军官，如柯尼希上尉和安德烈·德瓦弗兰上尉以及梯也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也投奔了戴高乐。募兵工作虽然不如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但到 7 月 14 日法国国庆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国”的队伍组织起来了。这一天，戴高乐在白厅广场检阅了他的战士。检阅完毕，他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盟军司令、法国的福煦元帅雕像献了红、白、蓝三色花束。同时，确定“洛林十字”为自由法国武装的标记。一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戴高乐的空军部队对鲁尔区进行了轰炸。到 7 月底，戴高乐已经动员了 7000 之众。

8 月，戴高乐在泰晤士河畔的圣史蒂文大厦安置了自己的办公室。自由法兰西政府初具规模。

8 月 7 日，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向全世界发表，协议载明戴高乐是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但协议中埋伏下了戴高乐和丘吉尔的争端，因为协议写明戴高乐也要听取英国统帅部的一般指示。而且协议也没有按照戴高乐的要求，明

确英国要对恢复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作出保证。戴高乐由此感到他不能完全依靠英国，必须到非洲殖民地去寻找更广阔、更坚实的基地。戴高乐决心为他手创的自由法兰西选择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一个更坚实可靠的基础。

戴高乐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本来是北非，但是总督诺盖斯支持了贝当政府，便决定先从西非入手。西非的情况对戴高乐要有利得多，到8月底，乍得、喀麦隆、刚果、乌班吉先后通电支持戴高乐。为了迅速确立自由法国在非洲的影响，戴高乐于8月底至11月25日亲自到西非开展工作。

第一站是塞内加尔。戴高乐乘坐“韦斯特兰号”于8月31日从利物浦出发，丘吉尔派了英国舰队协助，英国的斯皮尔斯将军作为丘吉尔的联络员和戴高乐同往。英国对戴高乐的非洲计划极感兴趣，因为它的成功必须对英属西非产生很大影响。戴高乐远征塞内加尔的计划没有成功，因为在他动身时，贝当政府已派出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自土伦出发，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先于戴高乐到达达喀尔。戴高乐决定继续驶向达喀尔，强行登陆。但是，由于遇上了大雾弥漫的天气，英国舰队无法顺利行动，岸上的炮击也使舰队不能迫近。

戴高乐受挫后即驶向喀麦隆、乍得、刚果，这里是自由法国的势力范围。9月下旬，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乔治·卡物鲁将军赶到拉密堡与戴高乐会合，表示接受戴高乐的领导。卡特鲁的军衔本来在戴高乐之上，但他甘愿居于戴高乐麾下，这件事大大有助于戴高乐的声威。

10月24日，戴高乐到达布拉柴维尔。这时，“自由法国防务委员会”的人选已经就绪了。10月27日，是继6月18

日后另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发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维尔宣言》。宣言指出：设在维希的贝当政府已经沦为敌人的御用工具。

“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承当领导法国投入战争的重担。形势把这一神圣职责交给了我，因此我将义不容辞。”

“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就在今天，我组成了一个帝国的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正在法国各地行使职权的人、或者集中了本民族的最高智慧和道德价值的人所组成，它将和我一起代表为生存而战斗的国家和帝国。”

宣言最后说：

“我们将为了法国去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竭诚为它服务，确信取得胜利。”

防务委员会行使政府的职能，自由法国从此有了它的政权机构。11月17日，戴高乐离开非洲回伦敦。他不虚此行成绩昭著：几个月前还只是处于胚胎状态的自由法国，已经建立起行使政府职能的、初具规模的权力机构——防务委员会；争取到了那么多有影响的重要将领和文职官员，如乔治·卡特鲁将军、爱米尔·米塞利埃海军中将，爱德加·德·拉米纳将军、费利克斯·埃布厄总督、亨利·索托总督、总军医阿道夫·西塞将军、勒内·卡桑教授、梯也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勒克莱尔少校等，虽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控制北非，但是毕竟有了包括整个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在内的辽阔的作战基地，这片基地从撒哈拉延伸到刚果、从大西洋延伸到尼罗河盆地。建立了自由法国自己的武装力量，活跃在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配合英国军队打击意大利法西斯军队。

戴高乐返回伦敦时，勒克莱尔少校率领的部队正开始在乍得准备向菲赞地区的意大利法西斯阵地发起进攻。同英军一起，自由法国的海军和空军开始行动了。一支远征部队正在准备着开赴中东战场，同德国法西斯作战。

戴高乐有了比较大的信心，他后来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现实虽然是残酷的，但我仍然可以掌握它；因为用夏多勃里昂的话来说，我可以‘用梦想来引导法国人奔向目标’”。到1941年9月21日，他所领导的第一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像一个政府那样堂而皇之地组织起来了。

委员会主席戴高乐是政府首脑，各个委员则相当于各个部的部长。至此，戴高乐完成了三件在法国现代史上有转折意义的大事：第一，从法国沦陷的第一天起，他还只是孤身一人的时候，就以大无畏精神高擎起抗战的旗帜，向法国人民发出了救亡的战斗号召；第二，由于他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所以很快地赢得了一批军政人员的支持，在广漠的西非各地树起了“六·一八”的旗号；第三，在不长的时间有了一支为自由法国所用的武装力量，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行年半百的戴高乐总算真正有了为法兰西的独立事业施展才干的广阔天地，他的抱负、理想和韬略才真正插上了翅膀。戴高乐写到《战争回忆录》第一卷的最后一段时，发出了如下几句极富激情的“召唤”：

“不必再多怀疑了！注视着祖国陷入的深渊，我，我这个法兰西的儿子，在召唤它，为它高举起火炬，指给它得救的道路。许多人已经和我联合起来，我相信还会有人要和我联合在一起。我现在能听到法兰西在回答我。它从深渊中再次

升起，它在前进，在爬上陡坡。啊！母亲，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里等候着为您服务。”

戴高乐首创法国的抗战事业，少不了英国的帮助。当戴高乐几乎还是孑然一身时，是丘吉尔接待了他，允许他利用英国电台宣布：“我，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即使戴高乐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以后，也还必须同英国军队组成联合部队，才能在非洲和近东作战。经过几个月的惨淡经营，戴高乐总算建立起自由法国的别具特色的政权机构。这个政权机构的元首总部在伦敦，队伍在非洲和近东，委员们分别担任北非、地中海东部地区、西非、拉丁美洲等地区的驻地代表。

丘吉尔和戴高乐两位政治家几个月以前初次会面时，相互都以为自己是“慧眼识英雄”，然而，“英雄”在一起并不一定和谐，戴高乐发现这位比较强大的朋友时常不按照自由法国、亦即是戴高乐的意愿行事，有时干脆不理睬戴高乐。戴高乐身在伦敦，但绝不想长期寄人篱下。

在1940年的7月3日，即有历史意义的“六·一八”演说发表后十多天，英国海军以压倒优势的火力突然袭击了停泊在朴茨茅斯和普利茅斯的法国贝当政府的舰艇，缴获了舰艇若干艘，小型舰只200艘。理由是，贝当与希特勒签订的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贝当政府的舰队必须解除武装。丘吉尔说，如果这些舰队落在德国人手里，必会加重对英国的威胁，因为这些舰艇通常散泊在英国、地中海、非洲以及马提尼克等地的港内。同一天，英国还炸毁了停在米尔斯克比尔海军基地的战列舰“布列塔尼号”。

贝当已经投敌，袭击和炸毁他的舰艇，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戴高乐却觉得英国此举包含有某种无法明说的动机，反映了“旧时海上竞争的气息，以及自从法国战事开始以来日积月累的仇恨，到维希政府签订停战协定以后就更加发作起来了。”戴高乐觉得，英国突然对贝当的海军动武，使本来可以归附“自由法国”的人也不来了，而且使那些对自由法国抱迟疑态度的人变成了反对派，贝当政府也会大力加以利用，从而影响戴高乐争取法属非洲的努力。

戴高乐还认为，当时法国舰队不可能向英国主动挑衅。达尔朗虽然是个贝当分子，但是只要海军在他手里，他就不会把这个资本拱手让给德国人。这件事在英法关系上投下了一道阴影。英国在决定这样做之前并没有征求过戴高乐的意见。

丘吉尔——戴高乐的“八·七协议”使英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这对于法国的抗战诚然是一大推动，表明英国承担了与自由法国结成联盟的义务。但是，戴高乐感到别有弦外之音的是：英国只同意写上英国对于恢复法国本土的疆界作出的保证，即“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而不愿对恢复“法兰西帝国”，即包括法属殖民地在内的疆界承担义务。这也就是说不能担保日后英国垂涎乃至染指法属殖民地的领土。此外，协议一方面称戴高乐是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另一方面又写明“最高统帅”还需接受英国的指示并把一部分部队交给英国司令指挥。自由法国还相当弱小，只能接受这类条款，但它在尔后的英法战时同盟关系中播下了摩擦的种子。

1940年底从非洲回到伦敦，就在元旦那一天，戴高乐正

在郊外别墅和家人一起，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要求戴高乐火速到伦敦会面。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差一点使戴高乐同英国政府反目。

艾登见到戴高乐时告诉他，自由法国驻英最高司令爱米尔·米塞利埃海军中将跟贝当伪政权勾勾搭搭，在英法联军远征塞内加尔之前曾图谋把计划透露给贝当驻非洲的司令官达尔朗。米塞利埃给驻伦敦法国领事馆提供的情报已经被英国情报机关截获了。艾登说，丘吉尔鉴于事情的严重性，在报请内阁批准后，下令逮捕了米塞利埃。

戴高乐听完以后满心孤疑，他对艾登说，英方手里的情报是否确实很值得怀疑，不足为证，而且英国竟然事前不打招呼就硬行逮捕了一名法国的海军中将，起码是粗暴无礼的。戴高乐要求立即释放米塞利埃，他亲自到伦敦警察厅去看望了被囚禁者，确信英国情报机关截获的所谓“情报”纯属捏造。

1月8日，戴高乐召见斯皮尔斯将军，强烈要求在24小时内释放米塞利埃、赔礼道歉，否则，自由法国就和英国“断绝关系”。据说，斯皮尔斯承认确实搞错了，“情报”也的确是假的。第二天，丘吉尔和艾登在唐宁街10号会见戴高乐时正式表示歉意，并且保证立即释放米塞利埃。

这件事情本身就算结束了，但是影响却很深，戴高乐追述所谓米塞利埃事件时说：“我不能掩饰这一可悲的意外事件出现在我们和盟邦英国经常动荡不定的关系中，使我对彼此应当如何相处的看法大受影响。”其实，米塞利埃并不是戴高乐值得中意的人，他后来终于与戴高乐闹翻，投奔戴高乐的

政敌亨利·吉罗去了。

战局的发展使地中海东部地区，包括法国所属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空前吃紧。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缔结同盟条约，10月4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勃伦纳山口会晤。8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开进罗马尼亚；28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佛罗伦萨再次会晤，同一天，意大利军队穿过阿尔巴尼亚入侵希腊。11月，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反动政府先后参加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沦为法西斯的附庸国。

进入1941年，德国军队在3月1日占领索菲亚，保加利亚沦为法西斯附庸国；3月25日，南斯拉夫的反动政府参加了法西斯集团。接着，德国法西斯军队从匈、罗、保边境涌进南斯拉夫和希腊。

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局势直接影响中近东局势。戴高乐看到，如果维希伪政权控制的叙利亚和黎巴嫩被德国占领，依靠海外基地作战的自由法国便将蒙受极大的损失和压力，所以戴高乐对于苏伊士运河地区一带的局势予以特别关注，但戴高乐要从贝当手里夺得叙利亚和黎巴嫩，也必须依靠同英国的联合行动。在这块不大的地段里，交织着几对矛盾。英国是否愿意帮助戴高乐呢？

戴高乐决定亲自去中东。丘吉尔派斯皮尔斯将军作为他的代表与戴高乐同行。3月14日，戴高乐和斯皮尔斯先到开罗，戴高乐将在这里指挥自由法国军队在中东地区的行动。

戴高乐到中东后的第一步是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戴高乐对自由法国驻中东代表乔治·卡特鲁说：“到了那里，法国

就有机会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这个机会如果失去，法国也就完了，假如轴心国家得胜，叙利亚和其他地方一样，将由轴心国来统治。如果轴心国遭到失败，英国将取得我们的地位。因此只要有机会，自由法国的统治权就必须伸展到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去。”

然而，时机却还没有成熟。最佳方案是维希伪政权的驻军倒戈，归附戴高乐，自由法国将因此扩大队伍，增强抵御德军的实力。但是局势正朝相反的方向发展，维希政府新上任的外交部长达尔朗加紧同希特勒勾结，准备允许德国使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这时德国空军不断袭击苏伊士运河，希特勒的部队插向叙利亚是并不需要很大力气的。乔治·卡特鲁告诉戴高乐，维希政权在叙、黎的驻军没有丝毫归顺自由法国的动静。

看来只有采取军事行动一途了。但问题是英国无意、也没有能力马上集结力量兼顾该地区。英国军队正在巴尔干和利比亚一带同德意军队周旋。戴高乐不止一次向英国驻埃及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提出， he 可以把梯也里·勒让蒂约姆指挥的自由法国第一师调归韦维尔统率，组成东征叙利亚的英法联军，条件是保持这个师的独立建制，并仍归勒让蒂约姆指挥。据戴高乐说，英方一直拖延不决，以至那个师团始终无法集结待命，自由法国的一些舰艇死气沉沉地停泊在亚历山大港，无所作为。

法属索马里的情况也没有什么进展。勒让蒂约姆是负责这个地区的，凡有倾向于自由法国的法国军政人员，都可以同他取得联系。戴高乐到开罗后开展的另一项活动不是争取

法属索马里的卫戍部队起义。但是维希伪政权驻索马里的总督埃尔埃塔颁发了一道“法令”，宣布：谁要是投奔戴高乐就军法从事。戴高乐曾与英国谈妥，由英国舰队对法属索马里实行封锁，配合戴高乐的行动，迫使维希政权的驻军在封锁的压力下向戴高乐投诚。但是，英国根本没有履行协议。乔治·卡特鲁还告诉戴高乐，英国人有同维希政权暗自接触的迹象，因为英国想使用吉布提港和吉布提到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戴高乐立即向丘吉尔提出了抗议，丘吉尔才命令韦维尔恢复封锁。戴高乐对于英国的表现很不满意，联系到2月间英国海军部竟听任黎巴嫩的维希当局把政治上倾向于戴高乐的法国人遣返回国，却没有让自由法国在中东的代表开展争取工作一事，更觉得英国别有用心。

在东征叙利亚、黎巴嫩的对抗尚未成熟前，戴高乐曾多次往返于开罗和布拉柴维尔之间，视察“六·一八”以来他在非洲建立的第一片基地。负责这个地区工作的是勒克莱尔少校，他正奉命组织沙漠纵队。这里自由法国的军队装备还很差，武器也少，还要与英国军队协同与侵入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作战。这时，德国军队已经在北非登陆，窥伺着摩洛哥、喀麦隆、多哥、刚果。意大利军队则企图插入突尼斯后，和德军汇合折向乍得。戴高乐感到，他必须抓紧一切机会加速赤道地区的组织工作，把它建设得更加稳固，万一中东失守，这里好歹可以成为抵抗德意法西斯的“防波堤”和未来举行反攻的基地。

5月12日，维希政府和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达成协议，维希政府同意希特勒使用叙利亚的飞机场和港口。英国

和自由法国必须采取军事联合行动了。但这是一场同床异梦的“联合行动”：戴高乐觉得“幕后”正在酝酿着某种“政治冲突”，因为英国显然想在整个中东建立自己的“领导权”，“企图取代法国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地位”。

戴高乐为了确立自由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控制，决定解决战斗后马上宣布结束托管，并和叙、黎的新政府签订条约，这样就可以抵制英国影响。为此，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他委派乔治·卡特鲁着手准备宣布叙、黎独立的声明。英国驻中东的代表米莱斯·兰普森爵士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卡特鲁提议，这个声明应由英国和自由法国联合发出。戴高乐坚决拒绝。英方又建议在声明中加进英国保证法国将履行诺言的内容。戴高乐又拒绝了，指出：这是法国的事情，用不着任何别的国家来担保。

6月16日，即英法联军开始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前两天，丘吉尔亲自给戴高乐发电报，重提把英国的“保证”写进声明的要求。戴高乐予以拒绝。后来，卡特鲁起草的声明照原样发表，英国政府则单独发表了另一个声明。戴高乐对这件事十分懊恼，他写道：“事实很明显，我们的伙伴希望造成一种印象，即让人认为叙利亚与黎巴嫩获得独立是出自英国的力量，这样，在下一阶段，它就可以在我们和东地中海国家之间作仲裁人。”在东征过程中，戴高乐把指挥部设在耶路撒冷。6月8日，英国军队和自由法国的军队开始进攻叙利亚和黎巴嫩。

当能预见到英法联军可以控制局势的时候，维希政府的东地中海地区高级专员孔迪便试探停火的条件。戴高乐19日

同英方代表兰普森商谈了这件事。紧接着，英法联军于 21 日开进大马士革，两天后，戴高乐来到叙利亚首都，马上派卡特鲁为自由法国驻东地中海地区的全权代表，稳定政治和经济局势，准备订立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和与法国结盟的条约。戴高乐准备甩掉英国，独自接管维希政权统治下的这块属地。戴高乐于 6 月 28 日向丘吉尔提出，英国在中东对法国采取的态度必须从英法同盟的观点出发，提醒丘吉尔尊重法国的权益。与此同时英国正积极准备同维希方面举行停战谈判，而且不打算让戴高乐以平等的身份参加。

7 月 13 日，英方代表和维希政府的代表在圣让德阿克举行停战谈判，卡特鲁虽然作为自由法国的代表参加了，但签订的条约却只字未提法国的权益。维希政权同英国作了一笔交易：英国势力得以进入叙利亚的黎巴嫩，在那里建立英国的军事指挥部，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组成的“特种部队”置于英国的指挥之下，维希政权在叙、黎的军政人员则遣送回法国本土。戴高乐从这里补充自由法国力量的指望落空了。

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看到了条约的文本，感到受到了嘲弄，痛斥英国“怀着一肚皮不可告人的动机”作了这件“甚至在形式上也把盟友自由法国抛到一边”的肮脏事情。英法关系骤然紧张。

7 月 21 日，戴高乐在开罗会晤了刚刚到来的负责中东事务的英国国务大臣奥利佛·李特尔顿。戴高乐对李特尔顿说，英国和维希政权签订的停战协定是无法接受的，作为两国共同作战的结果，竟是英国从法国手里夺走了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权”。戴高乐还说他一定要把驻在叙、黎的维希军

队争取到自由法国方面来，绝对不能听任英国把他们遣返。李特尔顿辩解说，英国并不打算控制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所作的只是在进军当中所必须作的，他援引 1940 年 8 月 7 日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协议说，在战争期间，自由法国的军队也要接受英国指挥部的领导，所以英国有权这样作。戴高乐指出，“八·七协议”只限于共同作战的时候，绝不能任意扩大到“法国辖区的主权、政策或行政事务”中来。戴高乐表示自由法国将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所以从 24 日起自由法国的军队就不再从属英国的最高统帅部，卡特鲁将奉命接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全部政权。谈话后，戴高乐把一份准备好的照会交给了李特尔顿。

李特尔顿走后，戴高乐立即给丘吉尔发了一封电报，说圣让德阿克协议违反了自由法国的军事和政治利益，损害了法国的尊严，后果是严重的。电报说：“在与我们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英国这种态度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戴高乐寸步不让，迫使英国就圣让德阿克协议的解释问题同戴高乐的代表进行了几次谈判。结果英国方面作了让步：自由法国可以同维希部队接触，以争取他们投诚；有关战争物资属于自由法国；英国不再要求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如果维希当局发生重大违犯停战协定的事件，英国军队和自由法国军队将联合行动使其就范。这是 7 月 24 日的事。但是，维希的军队依然照旧集结起来被遣返回国，戴高乐只争取到了几千名法国和当地军人。英国和自由法国对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争夺并没有结束，不和的种子埋得更深了。几件事端积累起来使戴高乐时刻感到英国正贪

婪地觊觎着法国在中东的利益，以致在筹划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长期斗争的同时，警觉地注视盟友的动作。但自由法国羽翼还没有丰满，还需要英国的合作，决裂是不行的。于是，戴高乐拜会了新任英军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表示自由法国的军队在共同作战中将在奥金莱克的统帅下继续作出贡献。

欧洲战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发展，6月22日，德国军队从白海到黑海的2000英里长的战线上向苏联发动进攻。战争从巴尔士转到了苏联领土。

戴高乐认为，他在中东和非洲已经有一些成绩，应该把注意力转过来为自由法国打开外交局面，他决定回伦敦去。回伦敦的中途，他在布拉柴维尔接见了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乔治·威勒，不料引出一段加深误会的插曲。威勒问他，英国政府既然已经承认了自由法国，却一直不肯对维希政权关上大门，戴高乐该如何理解这种情况。戴高乐说：英国政府担心的是维希的舰队会落到德国人手里，这其实是英国与德国的一笔战时交易，维希政府在这笔交易中充当了中介人。维希把法兰西帝国出卖给了希特勒，同时答应英国不使法国舰艇落在德国手里。在谈话中，戴高乐还提到自由法国愿意向美国提供法国的属领基地。戴高乐在去伦敦的飞机上看到了威勒写的采访草稿，马上打电报提出：除非威勒修改文稿，否则他不同意发表。但是已经晚了，电稿已被寄出。8月27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在显著地位刊登了题为《戴高乐向美国提供非洲港口》的威勒电稿，引起了美国舆论界的骚动，因为美国还不是交战国，当时还无意卷入战争。国务

卿赫尔被问到基地问题时，断然说他不知道这件事。

最恼火的自然是丘吉尔，他指示外交大臣艾登，戴高乐到伦敦后暂时不要去理睬他，同自由法国正在进行的谈判也要暂时停一停。丘吉尔决定给这位桀骜不驯的将军一点颜色看看。

戴高乐 9 月 1 日抵达伦敦后果然立即要求会见丘吉尔。丘吉尔说必须先澄清《芝加哥每日新闻》上登的消息，否则会见是毫无意义的。戴高乐说这个报道完全歪曲了他的意思，他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与英国一起战斗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戴高乐向布拉柴维尔发了一封电报，命令自由法国的代表把那个美国记者赶出刚果。丘吉尔于 12 日会见了戴高乐。双方都力图澄清自己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立场，但是，隔阂已经很深了。

戴高乐虽然流亡在伦敦，但是他绝不允许英国干预自由法国内部的事务。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和自由法国两个并肩作战的盟友仍经常不断地发生摩擦，在后来的 1945 年几乎发生了直接冲突。

戴高乐确曾向美国发出过呼吁。1941 年 5 月 19 日，他委派勒内·普利文作为自由法国的全权代表到达华盛顿，争取同美国建立经常性的联系，要求罗斯福及时向喀麦隆、乍得和刚果派驻空军，自由法国控制下的太平洋属地也可以为美国提供便利。因为一旦美国参战，它必须以非洲为基地，才能向欧洲进攻。但是，普利文 6 月到达华盛顿后却受到冷遇，他发现美国对自由法国几乎视而不见，也不打算同维希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美国漠视法国从 1940 年 6 月以来发生的变

化，罗斯福认为贝当出任总理无非是政府领导人的更迭，幻想贝当政府通过温柔的手段抵制希特勒，相反，对于流亡国外坚持抵抗斗争的戴高乐，却认为不可信任，美国驻维希政府的大使李海海军上将和驻北非的代表罗伯特·墨菲竟然轻信贝当的话，认为戴高乐的出走是“叛变”行为。在罗斯福总统、国务卿赫尔等人的眼里，戴高乐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自由法国是一个没有代表性的“非法团体”，只能在涉及美国自身利益的问题上同它接触，在涉及法国利益的问题上就不能同它打交道。

一次，美国国务院准备同普利文和英国驻美使节讨论美国支援英法抗德战争的问题。国务院提出，普利文只能以“专家”名义、不能以自由法国代表的身份参加。普利文立刻向戴高乐报告了这件事。戴高乐8月9日复电普利文，指示他坚持原则，一定要以自由法国代表的资格参加会谈，否则就拒绝出席。戴高乐指出，自由法国需要的是作战物资，而不是医疗用品这类的救济品。

经过斗争，美国作了一些让步。9月，赫尔宣布美国和自由法国之间有共同利益。10月，罗斯福致函斯退丁纽斯，决定把租借法案的受惠范围扩大到自由法国。但是这并不等于承认自由法国，罗斯福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美国将来用得着戴高乐所控制的非洲地区。

至此，美国和自由法国总算建立了某种关系，戴高乐可以在租借法案范围内得到一些美国提供的作战物资。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政府自从希特勒向苏联发起进攻后，同自由法

国很快建立起相当于外交关系的正式关系，相互派遣了代表。1942年5月，莫洛托夫到伦敦与英国商讨延长英苏互助条约问题。戴高乐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两人都表示要加强反对希特勒的同盟关系。莫洛托夫表示支持自由法国的斗争，戴高乐表示将使用自己的影响，力争西方盟军尽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此时，苏联正处于莫斯科保卫战前夕，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支撑着欧洲战局，当然希望西方盟军早日在欧洲登陆，以夹击共同的敌人。这一年的12月，戴高乐的军队占领纽芬兰附近的法国领地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戴高乐就此于10日致函丘吉尔，向他通报：“目前穆兹利埃海军中将正率领着‘米漠萨’号、‘阿利斯’号和‘阿贡尼’号这三只轻巡洋舰由纽芬兰前往哈里法克斯。他打算立刻前去把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争取过来”。信中说，这是一次“小小的奇袭”。美国认为这是戴高乐对门罗主义的挑衅，但在既成事实面前只好接受。这是罗斯福和戴高乐直接发生龃龉的第一件事。

1942年5月的一天早晨，戴高乐突然得知：一支英国军队在法属马达加斯加东北海岸登陆。数月前，戴高乐就曾几次敦促盟国支持自由法国占领马达加斯加，丘吉尔没有理睬，现在英国越俎代庖了。依丘吉尔看来，自由法国根本没有独自登陆的条件，英国则由于日本军队已对太平洋威胁而急需占领这个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岛屿。更重要的是，丘吉尔在作出决定之前，取得了罗斯福的同意，戴高乐却完全被撇在一边。事后英国向盛怒之下的戴高乐表白，英国对于马达加斯加没有任何领土要求，马达加斯加是属于自由法国的，这次登陆只是出自太平洋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的一份公报也说，

战争结束以后，马达加斯加将立即还给法国。

戴高乐立即下令在赤道非洲集结一个旅的兵力，作出整装待发，随时可以开赴太平洋的姿态。同时十分愤慨地对丘吉尔说，如果盟国把法国的领地一块一块地拿了过去，法国和英美的合作将无法维持下去。

6月10日，丘吉尔邀戴高乐面谈，丘吉尔竭力安抚戴高乐，既祝贺自由法国的军队最近在非洲以很有力的攻势打击德军取得的胜利，又故作坦诚地说戴高乐对于英国在马达加斯加采取军事行动不满是有理由的，但英国对这个岛绝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他在结束谈话时一再对戴高乐表示友好：“我一定不会抛弃您，您相信我好了。”三天之后，艾登再次向戴高乐提出保证，表明英国对于整个法兰西帝国，特别是对于马达加斯加没有任何企图。

风波又过去了。戴高乐感到，自从美国在战争舞台上正式登场以来，盟国间的关系更复杂了。每当自由法国同英国或美国发生摩擦时，英美总是站在一起的。戴高乐不可能摆脱“一对二”的局面。戴高乐和丘吉尔会晤时早已没有了他们合作初期那种气氛，有时不免争吵得面红耳赤。

1942年5月21日，美国新任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拜会了戴高乐。事后，艾登向戴高乐透露，美国政府可能正在考虑对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的态度。7月9日，美国发表公报，承认自由法国是法国抗战力量的象征，美英两国政府认为，法国政治前途答案将在自由和没有强制的条件下决定。公报措词含糊，只能表明罗斯福不能再完全忽视戴高乐的存在了。罗斯福一直顽固地拒绝承认戴高乐的全国委员会，他曾

经对美国驻北非代表说，在法国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政府之前，他绝不承认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就是法国政府。罗斯福在英国军队登陆马达加斯加时对丘吉尔说，美国是目前唯一能够同维希政权打交道的盟国，他不能把这种联系割断，所以美国虽然支持英国的行动，但是不便公开为英国作些什么。7月中旬，戴高乐决定把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这时，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已开始承认戴高乐愿意接受他的领导。从自由法国到战斗法国，其意义不仅是改变了运动的名称，而是反映戴高乐领导的抗德斗争的规模有了更大的发展，他的影响不仅存在于海外，也得到了国内抵抗运动的拥护。

7月23日，戴高乐会见了美国的高级海陆军将领，他们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海军参谋长金海军上将，驻欧美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中将等。戴高乐向他们提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马歇尔等人只听不说，实际上他们正在准备先在北非登陆的计划，根据罗斯福的意见，这个代号为“火炬”的北非登陆计划要对戴高乐“保密”，甚至不能像丘吉尔主张的那样，在登陆的前一天通知戴高乐。

但是，这样军事行动是不可能完全保密的，丘吉尔不久即任命亚历山大将军担任总司令，蒙哥马利将军为第八集团军司令。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英美联军攻入北非，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的驻军被击溃。11月11日，正在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的外交部长弗朗索瓦·达尔朗与美国的克拉克将军签署了停战协定，使英美联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占领了阿尔及尔。

奇怪的是，罗斯福居然让达尔朗留下继续担任在北非的

法国代表，原来维希政府派驻的总督诺盖斯等军政人员也一概留任。同时把来到阿尔及尔的法国五星上将吉罗安排为达尔朗的第二把手。显然，罗斯福不打算让准备到阿尔及尔来的戴高乐插手。

起用达尔朗与排斥戴高乐，在英国和法国都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丘吉尔认为罗斯福根本不了解法国的情况，竟然对作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核心和法国荣誉的火焰”的戴高乐及其组织，抱着如此“强烈的敌对情绪”。丘吉尔写信给罗斯福申述说，英国政府对戴高乐和他领导的运动承担着庄严义务，他们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丘吉尔认为应该把法国的一切反德力量组织在一起，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应该邀请戴高乐来阿尔及尔。丘吉尔在另一封信中还坚持，对达尔朗的安排只能是权宜之计，容纳这样的人会对法国及至全欧洲的抗德大业造成严重的政治损害，人们会认为英国和美国正在到处与吉斯林式的人物缔约。

在丘吉尔的一再坚持下，罗斯福同意请戴高乐到阿尔及尔来。圣诞节前夜，达尔朗突然被暗杀。吉罗立即接任。在美国的支持下，吉罗准备成为法国海外抵抗运动的总代表。

阿尔及尔发生的事对戴高乐的尊严是极大的冒犯。戴高乐既然不可能屈尊在达尔朗之下，当然也不能当吉罗的副手。

亨利·吉罗是五星上将，军阶比戴高乐高，资格比戴高乐老，早年戴高乐在麦茨服役时，吉罗曾是他的上级。吉罗完全是行伍出身，一度曾追随过贝当，现在靠美国人的支持硬要充当统领法国抗战的领导人。戴高乐认为，战斗法国的力量已经布满赤道非洲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要打回欧洲，解

放法国，就必须进入北非，而且这是他1940年6月出走伦敦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 he可以和吉罗合作，为此，吉罗到达阿尔及尔后，戴高乐主动多次写信给他，建议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抗德运动进行磋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战斗法国淹没在吉罗领导的运动里。戴高乐还坚持，他和吉罗的关系是法国人之间的事情，可以在阿尔及尔谈，也可以在贝鲁特谈，但绝不能在美国的导演下去讨论法国的事情。

丘吉尔和艾登奔走于罗斯福和戴高乐之间，既规劝罗斯福，必须看到戴高乐的战斗法国是法国最早抗战组织，又劝说戴高乐让步。戴高乐对丘吉尔说：他不明白英国人为什么总是听美国人的，英国是最早在北非作战的，把隆美尔的军队打败并向利比亚挺进的正是英国军队，而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兵一卒同希特勒交过手。然而，丘吉尔甘愿把在北非的指挥权让给美国。丘吉尔提醒戴高乐，英国不管怎么样也不可能做任何反对罗斯福的事情，如果有一天美国要把整个法属非洲的领导权都交给吉罗，英国也没有办法。

戴高乐决心为战斗法国的神圣主权进行坚决的斗争。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讨论战局，决定盟军究竟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还是先在西西里岛登陆。这是德国隆美尔的军队在阿拉曼防线已被英军突破。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已经把德国第六集团军团团围住，一场标志着战争转折点的保卫战即将开始。

根据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安排，吉罗先到了卡萨布兰卡。丘吉尔和艾登出面邀请戴高乐也到摩洛哥来与吉罗会面。开始时，戴高乐严辞拒绝，表示他同吉罗会晤与否和在哪里会晤，

是法国人之间的事，用不着“盟国高级法庭”来安排。经丘吉尔一再劝说，戴高乐于1943年1月22日来到卡萨布兰卡。戴高乐刚到便十分不快：摩洛哥本是法国所属的领地，法国人在这里谈法国的事却是在围着铁丝网，有美国兵守卫的地方进行！他第一次见到了罗斯福，也同吉罗进行了谈判，但丝毫未改变原先的立场，不愿同吉罗平分领导权。罗斯福则固执地认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权既不能交给吉罗，也不能交给戴高乐，而是要用吉罗来平衡戴高乐。比较而言，罗斯福更喜欢吉罗一些，因为他认为戴高乐傲慢偏执，根本不把美国放在眼里。他甚至认为，想不出另外一个人比戴高乐更加靠不住的。罗斯福几乎是强制性地让两个政敌握起手了。两个人握了手，也照了相，但是问题却一点儿也没有解决。

4月10日，吉罗向戴高乐提出一项奇特的建议：在阿尔及尔建立法国“海外领地委员会”，吉罗和戴高乐都作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对于这个毫无意义的建议，戴高乐决定不予理睬。4月15日，战斗法国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拥护戴高乐提出的成立一个拥有实权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张，由戴高乐出任主席，以吉罗为总司令的那部分法国军队置于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全国委员会宣布，戴高乐将以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前往阿尔及尔视事。这就是说，戴高乐的总指挥部从伦敦转到阿尔及尔。

经过几年的奋斗，戴高乐的实力和影响有了实在性的发展，他已成为海内外公认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和旗帜。北非各地都通电支持战斗法国。战斗法国在国内的影响也迅速扩大，戴高乐派往国内的抵抗运动的代表让·穆兰到5月中旬已组

成了包括各种派别的全国性抗战运动委员会，委员会表示拥护戴高乐，要求迅速在阿尔及尔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

相形之下，吉罗显然势单力孤，在这种情况下，吉罗于5月17日邀请戴高乐前来阿尔及尔，共商成立中央权力机构的大事。5月27日，让·穆兰主持召开了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正式声明的形式宣告一个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将在北非成立。英国和美国的广播电台转播了这项声明。

在离开伦敦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前夕，戴高乐在伦敦广播电台发表了简短讲话，号召法国人民，“为了法国的战争，团结起来！”“为了法国的伟大，团结起来！”“为了法国的复兴，团结起来！”

戴高乐还致函英王乔治六世，感谢英国政府对法国抗战运动给予的同情和支持。当时丘吉尔没有在伦敦，戴高乐拜会了艾登，向他辞行。艾登半开玩笑地说：“你知道吗？你给我们的麻烦比我们所有的欧洲盟国给我们的都要多。”戴高乐回答说：“我丝毫不怀疑这句话，因为法国是个大国呵！”

5月30日，戴高乐在全国委员会负责对外事务的委员勒内·马西格利和负责内务的委员安德烈·菲利浦的陪同下来到阿尔及尔。6月1日，戴高乐向法国记者散发了一项声明，宣布将尽早成立一个法国中央政权，以领导全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政权将享有真正的主权。宣告第二天，他本人、卡特鲁将军、马西格利和菲利浦先生就将同吉罗将军举行会谈，讨论成立法国中央政权问题。

第三章 荣誉顶峰——退隐归田

戴高乐 5 月 30 日抵达阿尔及尔机场时，前来欢迎戴高乐的有吉罗和英国、美国驻北非的代表。戴高乐和吉罗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从机场到官邸的汽车上进行的，气氛有些尴尬。戴高乐告诉吉罗，他准备派哪些人参加会谈，然后问吉罗这方有什么人出席。戴高乐以十分坚定的口气对吉罗说，无论如何，到现在还留在吉罗身边的那些维希分子一个也不能留在未来的中央权力机构中。戴高乐指的是维希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驻摩洛哥总督诺盖斯和法属西非总督布瓦松。

下午 4 时，戴高乐到邮政广场向死难者纪念碑献“洛林十字”，聚集在那里的数以千计的群众热情地向他欢呼。此时，戴高乐的心情是乐观而自信的，他的事业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他坚信，把那些维希政府派的“总督”赶走、迫使吉罗接受他的领导是天经地义，能够办得到的。只是吉罗背后站着罗斯福，不会轻易就范，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戴高乐决心对罗斯福的干预不予理睬。31 日上午，戴高乐和吉罗都如约来到弗罗兰坦中学举行会谈。战斗法国方面除戴高乐将军外，还有卡特鲁、菲利浦和马西格利，吉罗那一方有让·莫内和乔治。戴高乐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军队必须服从政府，如果在作战中由于与外国军队共同行动而需要受外国将军的指挥，也必须由法国最高当局的命令来决定。

第二，不承认维希政权，所以必须解除几位“总督”的职务。吉罗则坚持军队有独立于政府的领导权，表示绝不能解除维希分子的职务。但是，会谈的优势不在吉罗一边，让·莫内想从中调解，戴高乐一方的代表态度一致，吉罗方面只剩下乔治一个人。戴高乐感到形势对他很有利，他确信：他是被一层浓雾包围了的领航人，他也相信，如果他掌住舵，总会见到晴天的。

为了把他的决心公诸于世，6月1日他在格里西诺别墅向记者重申了向吉罗坚持的立场。戴高乐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6月3日再次开会，吉罗接受了戴高乐的主张，正式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它享有最高权力，军事力量置于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在委员会向将来组成的正式的临时政府移交权力以前，负责制定共和国法律，确立共和国政体。会议还决定，三位维希政权的总督都将去职。

但是，这样的机构的美中不足是戴高乐和吉罗都是委员会的主席，是一种“双头领导”的怪现象。戴高乐断定，英国和美国还会给他制造麻烦，还没有取得全胜。

戴高乐估计对了，英美都没有发消息，于是，他立即通过电台宣布：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诞生，“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以其身负重任并以其坚韧不拔的决心出现在法国和世界面前。”

丘吉尔突然在阿尔及尔露面了，艾登也来了。6月6日，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吉罗和委员会其他委员出席“乡村”宴会。丘吉尔警告戴高乐说，如果吉罗被“吞并”，英美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有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撑腰，吉罗还不想交出

军权。

罗斯福也露面了。10月，罗斯福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电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戴高乐把西北非洲都控制起来，美国甚至不惜派特别部队去牵制戴高乐。一星期后，罗斯福再次致电艾森豪威尔，指示他一定要设法阻止戴高乐控制法国军队。

6月19日艾森豪威尔邀请戴高乐、吉罗一起谈谈法国军队的“指挥和组织问题”。在场的还有美国的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英国负责北非事务的国务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

戴高乐首先发言，开门见山说他是作为法国政府主席来参加会晤的，按照惯例，国家元首或政府主席有权亲自到他们授予指挥权的总司令部去。艾森豪威尔是盟军总司令，他应该从这番话里懂得，他手中的指挥权，是由有戴高乐在内的盟国元首授予的，戴高乐绝不会屈尊于与他本人意愿相反的盟军司令的任何要求。

艾森豪威尔和蔼但又语带胁迫地说，盟军很快将在西西里登陆，戴高乐必须保证后方的安全，因此，法国军队的统帅和组织应该维持原状，吉罗应该保持现有的权力和职位，并且只有吉罗一个人有权同艾森豪威尔讨论北非的军事问题。艾森豪威尔以英、美两国政府的名义通知戴高乐，如果不按照他刚才所说的去做，英美就要停止向法国军队供应军火。

戴高乐驳回了美国的威胁。他指出，法国统帅的组织是法国政府权限以内的事。

会谈没有任何结果。戴高乐决定不理睬英美的“警告”，

把最高军事统帅权紧紧地掌握在民族解放委员会手中。

在这期间，拥护戴高乐的队伍更加扩大，许多后来曾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政治家，如爱德加·富尔等，都来投奔戴高乐。大大增加了民族委员会中戴高乐派的力量，戴高乐得以在委员会内组织了一个以他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吉罗虽然仍负责北非的军事问题，但独立行使职权的条件越来越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吉罗宣布罗斯福邀请他访问美国，商讨向法国军队提供装备的问题。7月2日吉罗动身去美，三个星期后回到阿尔及尔。戴高乐在这期间则访问了突尼斯和摩洛哥。

7月31日，民族解放委员会由“双头领导”正式变为戴高乐的单独领导。吉罗仍然当他的总司令，但在他的上头有一个由戴高乐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它的前身就是不久前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吉罗已经无能为力了。

在这之前，美国报刊透露，丘吉尔曾经向英国的驻外机构分送了一份指责戴高乐的“秘密”备忘录。据说，丘吉尔这样作，是为了配合吉罗访美，借此提高吉罗的身价。然而，戴高乐在吉罗问题上同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斗争中已胜券在握了。

让·穆兰为戴高乐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没有这个人，戴高乐运动在法国本土的成长和发展至少会推迟一段时间，戴高乐也不会享有那么高的声誉。

当巴黎沦陷时，只有三十多岁的让·穆兰是夏尔特尔省的省长。在人民阵线组成政府的1936—1937年，他是航空部长皮埃尔·戈特的办公室主任。当省长时，德军屠杀了村民，

却逼着让·穆兰承认是法国军队干的。让·穆兰断然拒绝，于是被捕入狱。获释后他不愿在投敌的伪政府内任职，便在1941年转移到还没有被占领的地区，同那里的抵抗运动取得了联系，并决定到伦敦去见戴高乐。

9月初，让·穆兰先到西班牙。11月的一天，让·穆兰来到伦敦。他给戴高乐的第一个印象是年轻、干练、才思敏捷，很有见解。他向戴高乐详细介绍了法国南方抵抗运动的情况，认为应该把分散的抵抗运动团结和协调起来。戴高乐很赞同这种想法，立即和让·穆兰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戴高乐认为，让·穆兰熟悉国内情况，与抵抗运动又有了联系，派他回国执行统一抵抗运动的计划，是最合适不过了。12月24日，戴高乐签署了委任书：“我委派让·穆兰先生，行政长官，为我的代表和全国委员会驻法国本土尚未直接被占领地区的代表。让·穆兰先生的使命是在该地区实现一切抗击敌人及其同谋的力量的统一行动，让·穆兰先生将向我直接报告他执行任务的情况。”让·穆兰带着两项任务回国：第一是尽可能地把国内的抵抗运动组织统一在戴高乐的旗帜下；第二，在国内建立一支秘密的武装力量，当战斗法国的军队配合盟军打回来时，举行全国性武装起义。

让·穆兰于1942年1月1日空降到法国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到3月已经把相当一批抵抗组织集合在他主持下的一个委员会里。不少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纷纷去伦敦会晤戴高乐。敌占区的工作也很见起色，也有不少人辗转离开法国投奔戴高乐，其中有像克里斯蒂昂·皮诺、皮埃尔·布莱索莱特那样的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家，像埃马努埃尔·达斯

蒂埃那样的社会名流。让·穆兰以其卓越的才能为戴高乐争取到许多拥护者，扩大了戴高乐在国内的影响。

国内情况很严峻。11月，另一个投降派赖伐尔，被任命为维希政权的总理。贝当—赖代尔政权加紧了投降活动，同时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维希政权的投降面目暴露无遗。抵抗运动在压迫下搏斗、成长。

1943年2月，让·穆兰和地下军司令德勒斯特从法国本土来到伦敦。戴高乐和让·穆兰商量的怎样把国人各党派的抗敌力量组织成一个“全国抵抗委员会”的问题，并且商定，让·穆兰为委员会的主席。戴高乐在官邸举行了向让·穆兰授与十字勋章的仪式。戴高乐同时命令德勒斯特进行一次总视察，为内线作战作好准备。3月24日，让·穆兰和德勒斯特启程回国。

5月15日，让·穆兰完成了戴高乐交给他的任务，以抗战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通电拥护戴高乐。至此，戴高乐从1940年6月开始到海外奠定抗战基业以来，在沦陷的法国国土上也发展了战斗法国的组织。这时，戴高乐在北非正在同他的政敌吉罗将军，以及同这位将军背后的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让·穆兰的工作，无疑对戴高乐是莫大的支持。

6月10日，正当抵抗委员会在里昂郊区聚会时，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们。让·穆兰备受酷刑后英勇就义，德勒斯特也献出了生命。1943年7月31日，对于戴高乐说来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它标志着戴高乐最后战胜了吉罗。吉罗虽然还是总司令，在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文件上还有副签的资格，但

是，他必须服从戴高乐的领导。7月初，法属西印度诸岛也归附了戴高乐，法属海外殖民地都在“洛林十字”的标记下成为戴高乐领导法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广泛基地。戴高乐对吉罗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示威。罗斯福执拗地企图把戴高乐排除在法国抗战队伍之外，使尽了招数。丘吉尔开始时想把戴高乐拴在伦敦，成为大英帝国的囊中物，但是这位“应运而生”的法国将军，身在伦敦，想的却是法兰西帝国的海外领地，抱负是作为凯旋者回到法国。戴高乐需要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但是绝不因此仰人鼻息，他顶住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种种压力和干预。

丘吉尔与罗斯福不同，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维希政权抱有幻想。当他看到戴高乐不可能就范，战斗法国已经坚实地站立起来，不能不想到，日后他还必须和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打交道。丘吉尔说服了艾森豪威尔，两人一起向罗斯福陈词：盟国必须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但是，问题并未解决，战斗法国仍然不能与盟国平起平坐。

反法西斯盟军在各个战线的胜利，特别是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改变了欧洲战场的面貌，盟军由防御变为反攻。7月26日，墨索里尼垮台，德意法西斯联盟宣告断裂。从各方面的态势来看，1944年将是一个决胜之年；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将从德国法西斯侵略魔爪下光复的一年。

戴高乐决心由他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解放法国的战役下，发挥最大的威力。9月18日，戴高乐和吉罗签发了一项备忘录，分送给美、英、苏三大国，坚持法国军队一定要参加在

地中海沿岸以及未来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另一份备忘录则提出，盟军解放法国时应该与战斗法国建立的行政机构合作。戴高乐担心会被盟国关在解放后的法国政府之外，从而沦为盟国的附庸。

美国和英国依然忽视戴高乐。关于意大利的停战谈判，戴高乐几乎一无所知。墨索里尼倒台后，继任的巴多格里奥要求停战，9月3日，美英同意大利签署了停战协定，直到9月8日盟军在南意大利登陆，戴高乐才得知此事。9日，戴高乐发表声明，指出法国必须参加一切对意条约的制定，并且对于没有被邀请参加对意停战协议表示不满。10日，法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吉罗所属的部队在科西嘉登陆。戴高乐于24日发表声明，说科西嘉战役表明法国有能力在解放欧洲的共同战斗中做出贡献。后来在11月底，战斗法国终于成为意大利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9月17日，戴高乐发布命令，宣布成立协商会议，它相当于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议会，由100名委员组成，其半数来自国内的抵抗运动。10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戴高乐和吉罗签署命令，宣告今后委员会将只有一个主席。同一天的另一项法令宣布将根据指挥与政权分立的原则，组织法国的武装力量。

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1月3日在阿尔及尔开幕。戴高乐发表了长篇讲话，指出战斗的法国从一开始就是法国的合法代表，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完善法国各种合法权力机构的重要步骤。同一天，戴高乐改组民族解放委员会，增加了国内代表，排斥了吉罗和吉罗的支持者乔治。

11 月底，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第一次在德黑兰会晤，当然没有戴高乐的份。三巨头讨论了法国的未来，也议论了戴高乐。斯大林说，戴高乐只能代表一个神话中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支持了贝当，它帮助了轴心国，所以法国应该受到惩罚，它的殖民地也不应该再还给它。罗斯福说，战后，印度支那不应该再回到法国，像达喀尔、新喀里多尼亚等战略要塞，都应该实行国际管制，战后的法国也不应该再是个大国了。丘吉尔的态度却有所不同，他说，不管怎么样，“自由世界”需要有一个繁荣的法国。德黑兰会议对于 1944 年战局作出了重要决定，盟军将举行以“霸王”为代号的横渡海峡的战役，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会议结束后，丘吉尔在北非停留。1944 年 1 月 12 日，丘吉尔和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见面。当时英国和美国报纸都透露，罗斯福有意在战后法国成立一个由英美控制的军政府。在谈话中，戴高乐向丘吉尔表示，他强烈反对罗斯福的计划，他指出，战斗法国既然已经在北非站住了脚跟，它也必定会胜利地返回法国。谈话后的第二天，戴高乐邀请丘吉尔检阅了他统率的军队。队伍接受检阅时，群情激动，热烈欢呼。

戴高乐蔑视罗斯福的法国不能再拥有原来的殖民地的说法，1 月 30 日在布拉柴维尔召开了非洲领地会议，戴高乐发表讲话，指出法国的将只能由法国自己来决定，法国将独自行使自己的主权。戴高乐还规划了未来包括法属殖民地在内的所谓“法兰西联盟”。

3 月 21 日，戴高乐发布命令，宣告：一旦法国本土有足够的领土获得解放，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立即迁回法国，

行使其职权。

3月27日，戴高乐明确表示：民族解放委员会将成为法国的临时政府；在它恢复民主的进程中，临时政府“绝对地”只听取“民族意愿”的意见，凡属“不是来自法兰西民族的任何教训”，一概不予理睬。4月8日，戴高乐自任法国武装力量的统帅，吉罗被委以总监。吉罗拒绝了这个荣誉职位，宁愿退休。这一切都使罗斯福非常恼火，但毫无办法。

横渡海峡的战役即将开始，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到英国来。6月4日，戴高乐搭乘丘吉尔派来的专机从阿尔及尔飞往伦敦。比起一年以前戴高乐离开伦敦前往阿尔及尔时，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英国完全浸沉在大战前紧张的气氛中。丘吉尔在指挥部会见了戴高乐。他们的谈话有使戴高乐感兴趣的地方，这就是解放欧洲的战役即将开始，虽然美国和英国准备诺曼底登陆的方案时，完全把戴高乐撇在一边，但是戴高乐重返祖国的日子毕竟越来越近了。谈话的后一半却激怒了戴高乐，丘吉尔建议戴高乐到华盛顿去见一见罗斯福，还说罗斯福对于戴高乐排斥吉罗一直很有意见。戴高乐说，目前他想到的只是解放法国的战争，对朝见罗斯福完全没有兴趣；法国的事情只有法国人自己来管，无需美国和英国插手。丘吉尔也发了火，他挑明说：如果要他在戴高乐和罗斯福之间进行选择，他只能选择后者。

在伦敦，戴高乐还会晤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向他介绍了渡海作战的准备情况。表示：盟军一旦登陆后，准备安排挪威、荷兰、比利时等国的领导人通过电台向本国人民

发表讲话，然后艾森豪威尔也发表一个讲话，并把准备好的讲稿拿给戴高乐看。艾森豪威尔建议戴高乐接着也对法国人民说几句话。艾森豪威尔的讲稿只讲盟军的成绩，只字不提戴高乐和战斗法国。戴高乐立刻表示不满，坚决拒绝在艾森豪威尔之后讲话。同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的这两次谈话，气氛都十分紧张。但是，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还是通过伦敦广播电台发表简短的讲话：“最崇高的战斗开始了！”“法国的战役打响了。在全国、在帝国、在军队里，只有一个共同的意志，一个共同的期望。”

诺曼底海岸登陆后，英美联军在一周内占领了60英里长的一条滩头阵地，登陆后的100天内，共有200余万人、45万万辆车、400吨作战物资投入战场，同东方战场上苏联红军的凌厉攻势形成有力的对敌夹击之势。

戴高乐从伦敦又回到阿尔及尔。在这期间，戴高乐于7月6日访问了华盛顿，同罗斯福进行了三次礼貌的、但是极不愉快的谈话。戴高乐得知，罗斯福认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石将是美、英、苏和中国四大国，而法国则自从1940年6月崩溃以后，就永远失去了大国的地位。戴高乐离开华盛顿以后，美国国务院于12日发表一项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确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会有资格在解放后的法国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利。

7月底，解放法国的战斗进入了新阶段。盟军诺曼底登陆迅速使德国法西斯军队溃退，通向巴黎的通道打开了。8月15日，法美联军进行了另一次两栖作战，在马赛和尼斯之间的普罗旺斯登陆成功。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于8月初在诺曼底登陆，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在法国本

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奋起响应，有力地打击了溃退中的敌人。

解放巴黎的时机成熟了。18日，戴高乐从阿尔及尔经直布罗陀回国，这时，解放巴黎的战斗正在展开。24日夜晩，勒克莱尔部队的前锋深入巴黎心脏，巴黎市区此时已经结束了战斗，德国侵略军已同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达成停火协议。第二天，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举行了入城式，美国第四师的一部分也随法军进入巴黎。德军驻巴黎卫戍司令冯·柯尔梯茨将军签署了停火协议，命令城内德军放下武器。

25日下午，戴高乐从巴黎的奥尔良门进入市区。随后，立即来到圣多明尼克大街陆军部旧址。四年前，戴高乐就是从这里撤离巴黎的，现在又回来了。景物一切依旧，一切都非常熟悉，但是，巴黎已经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在市政厅大门口迎接戴高乐的是抗战委员会的三位不同党派的领导人：乔治·皮杜尔、塞纳省省长马塞尔·弗洛雷和法国共产党委员安德烈·托莱。他们在客厅里分别向戴高乐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戴高乐也即席致了贺词。他像朗诵颂诗一样地说：

“巴黎！被敌人蹂躏过的巴黎！横遭破坏的巴黎！受尽千辛万苦的巴黎！同时也是解放了的巴黎！巴黎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巴黎是它自己的人民在法兰西军队的协助下，在全法国、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久的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下解放的。”

“啊！盘踞巴黎的敌人终于在我们手下投降了，法兰西又回到巴黎来了，它又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了。法兰西虽然遍体

鳞伤地回到巴黎，但它已锤炼得十分果断坚定。法兰西回到巴黎，巨大的教训使它清醒过来，它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比任何时候都要看得更明确。”

戴高乐呼吁全民族的团结，“法兰西的所有儿女，应当像兄弟一般携手并进，奔向法兰西的目标。”最后他高呼：“法兰西万岁！”

第二天下午，戴高乐来到凯旋门，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向他欢呼。这是他长久以来所渴望的一刻，在少年时代就已梦想的一刻。戴高乐在凯旋的乐声中丝毫不怀疑，他本人、他亲手建立的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是法兰西民族的代表，他应该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当然总统和缔造者。戴高乐从凯旋门在军队的将领们和抵抗运动的领袖们的簇拥下，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前往协和广场。戴高乐后来在《战争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啊！简直是人的海洋！也许有 200 万人。屋顶上黑压压的一片人。窗口里密密拥挤着人，人群中间夹杂着许多旗帜。梯子和柱子上边甚至也爬满了人。凡是能看到的地方，都是阳光灿烂、国旗飘扬下的人群的巨浪。”

戴高乐正处在荣誉的顶峰，他睥睨一切——罗斯福的傲慢、丘吉尔的权术，都不曾使他屈服；希特勒的疯狂也无法使他却步。他在 1940 年 6 月 18 日还只是个“零”，现在却掌握了法国的命运。

在激动与自豪之余，戴高乐预感到前面的道路并不平坦，“政治暗礁”已经“暴露出来了”。

戴高乐以民族英雄和抗战领袖的身份凯旋归来。战争还

在法国的土地上继续，但是第二战场已经开辟，希特勒处在东西夹击之下，一天天地走向覆灭的深渊。戴高乐终于实现了他的第一个报国宏愿，从拿破仑败绩以来不断威胁法国的那个不安分的邻居，正在失去他旧日的淫威。戴高乐 15 岁写的传奇性的“德国战役”竟然成为现实。然而，法国在国际舞台上仍然是个次要角色。法国未来的地位得听命于美苏英三大国的“恩赐”。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巨头几次讨论战后欧洲安排事宜时，戴高乐都没有同等的权利。这是戴高乐绝对不能释然的。只有丘吉尔还为戴高乐说几句话，说法国虽然在战争一开始就沦亡了，在战争中起的作用也有限，不能跟英国、美国和苏联相比，但是法国毕竟是个大国，特别是在讨论欧洲的未来和德国的管制问题时，不能没有法国的参与。最后三巨头同意了法国是联合国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法国也正式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以后的讨论法国问题的四国外长会议，在德国有了自己的一块占领区，法国也派驻了自己的占领军。戴高乐的法国曾经被排除在从德黑兰到雅尔塔的所有大国会议的门外，战后所谓雅尔塔体制是在没有法国的参加下制定的，自命不凡的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成了大国的小伙伴！戴高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决心为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而斗争。当临时政府迁回本土后，戴高乐就宣布：“对于战后与全世界人民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国参加就作出决定，那都是冒险行为……人类的任何重大事业，如果没有得到法国的同意，都将是非法的，因而也是不稳固的。”

戴高乐也绝不允许盟国染指法国在海外的“势力范围”。

戴高乐口中的“法兰西帝国”的完整性，包括了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不管在战争期间被谁占领，都应该不折不扣地回归“法兰西帝国”。如果这些领地发生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行动，也要由法国独自处理。

戴高乐在欧洲也遇到麻烦。丘吉尔 6 月 4 日在给杜鲁门的信中，提出了与戴高乐的又一个争端。这次是在意大利。西方盟军进军意大利时，戴高乐的部队进驻了阿尔卑斯山法国和意大利交界处的阿奥斯塔山区。当地居民都讲法语，戴高乐企图在战争结束后把阿奥斯塔划归法国版图。但事与愿违，6 月 5 日，杜鲁门致电戴高乐，要求法国军队立即撤走，否则美国就不再向法军供应军火。据说法军司令多瓦恩将军扬言，美国军队若开进阿奥斯塔，法军不会让步，甚至不惜一战。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便准备了一份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公开谴责戴高乐。并决定：如果戴高乐对电报不作出满意的答复，就公布谴责声明。丘吉尔在 6 日给杜鲁门的电报中说：“发表这个声明，就可能使戴高乐下台，在长长的五年经验中，使我认识到戴高乐是处在危难中的法国的最危险的敌人。”他还说，戴高乐是“对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之一。没有谁比英国人更加需要法国人的友谊，但我确信，归根结底，我们不会同戴高乐将军达成谅解”。

戴高乐终于同意撤走法国军队，并由皮杜尔出面答复杜鲁门的电报，说法国绝无意对美国军队使用武力。一场险些挑起的摩擦因戴高乐的让步化险为夷。

戴高乐在同英美两国领导人的较量中极不顺手，其结果往往不顺他的心愿。戴高乐虽然心比天高，但时时力不从心。

1945年7月25日，波茨坦会议期间，丘吉尔在英国大选中惨败，英国组成了工党政府。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追述了他对于丘吉尔这个“伟大人物”的亦敌亦友的复杂感情。同年11月13日，法国立宪议会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首脑之际，丘吉尔给戴高乐发来了热情的贺信。

戴高乐从1944年8月25日胜利地返回祖国以来，在外交上似乎政绩平平。戴高乐在1944年11月到莫斯科拜会斯大林，第二年8月下旬到华盛顿同罗斯福的继承人杜鲁门进行了七个小时的会谈，接着又访问了加拿大，回国前在伦敦会见了英国新首相艾德礼和外交大臣贝文。贝文告诉戴高乐，无论他同丘吉尔的个人关系如何，英国将和法国保持盟友关系。戴高乐深感为了跻身国际大家庭的大国行列，法国将不免长期地同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停顿地周旋下去，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处理法国国内的繁重事务。

戴高乐回到巴黎时，法国满目疮痍。昔日的繁荣变成一片废墟：约200万建筑物毁于战火，600万人无家可归，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达八十多万，还有五六十万人由于战争而成为残疾。

几千万英亩的土地荒芜了，粮食奇缺。1944年冬天，每人只能得到很少的配给食物。燃料严重不足，人民已经过了几个饥寒交迫的冬天了。

为了使法国摆脱极端困难的处境、治好长期战争给全民族的创伤，就必须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而发展工业，首先要解决缺煤问题。戴高乐决定充分利用与法国建立了经济联盟的萨尔地区和鲁尔地区。同时借助国有化政策推动工业生

产，他对加莱海峡、卢瓦尔省等地的煤田实行国有化，接管了煤气和电力，紧接着为了把资金掌握在政府手里，对法兰西银行和许多信贷机构也实行了国有化政策，后来又把几家十分重要的大企业也收归了国有，如法国航空公司、雷诺公司等。

戴高乐还制定了社会福利政策，如为工资获得者提供社会保险，实行家庭补贴，等等。同时，为了缓和劳资矛盾，鼓吹在企业内部实行“劳资合作”，成立“企业委员会”，提倡资本、劳动和技术的“联合”。

与经济问题相比，更使戴高乐伤脑筋的还是国内的政治局势。形势的发展显然已经超出了他设计的规范，同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相悖。通过让·穆兰组织起来的全国抗战委员会，早已不是清一色的“戴高乐派”，而已成为各个政党的联合组织。尤其使他忐忑不安的是曾在地下游击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法国共产党，在委员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巴黎的秘书处，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人占了很大比例。这些政治力量在反抗希特勒的战争中是曾支持和拥护戴高乐的。

戴高乐进入巴黎的第三天上午，就把抵抗运动的二十几位代表召集在一起。一则向大家表示祝贺，二则说明抵抗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巴黎解放了，临时政府马上就要从阿尔及尔迁回，所以今后的工作应该由临时政府统一领导，各方面的武装力量也不应再各成系统，统统编为由政府统帅和指挥的正规军。戴高乐的意思十分明白。他讲完以后没有给与会者留下发表意见的时间，便宣布散会，匆匆离去了。

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政党政治”成为事实：共产党享有极高的威望，社会党也活跃起来，皮杜尔领导的号称中间派政党“人民共和运动”成为第三大党，此外，激进党等也恢复了活动。但是戴高乐本人却还没有一个可以倚靠的政党。凭他的个人威望，他完全可以组成政府，问题是这个政府只能是包括若干政党的“联合政府”。

10月21日，法国就未来宪法问题和选举一个代替咨询会议的新的立宪议会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96%主张选举立宪议会，制订一个取代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新宪法。在新的议会中，法国共产党取得的席位最多，其次是社会党，再次是人民共和运动。

11月13日，立宪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虽然取得了一致的拥护，但是，那只是因为他在当时是唯一能够支撑法国政局的人，他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作他的坚强后盾。他的政策、方针等靠谁来执行呢？实际上，戴高乐无法左右众多政党形成的体制，他失去了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中那种一人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决策权。立宪议会享有立法权；政府要制定法律、决定财务、解决外交上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取得议会的多数支持。戴高乐是政府总理，但是议会议长却是社会党的费利克斯·古安。这样的政体使戴高乐感到被捆住了手脚，只有处理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权。在他的新政府中不得不容纳四名共产党部长，四名社会党部长、四名共和党部长，一名激进党部长，两名无党派人士和两名抗战民主联盟部长。这自然不是戴高乐所喜欢的政府组成。然而，实际被迫如此，戴高乐在11月21日只能按这样的部长

分配方案组成政府。戴高乐在赤道非洲发布的《布拉柴维尔宣言》中曾庄严地宣布过：一旦法国本土有了名副其实的代表，他愿意移交政权。戴高乐自问：在不能有效地行使他本人的控制权时，该怎么办？

戴高乐深深感到“我道不行”，不由自主地堕入政党政治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拔，竟然无能为力了。他第一次想找一外僻静的所在，静静地过一个假期。1946年1月上旬他到了地中海之滨的昂提布。从到伦敦宣布自由法国诞生起已经六年了，在这紧张的六年当中，戴高乐时而戎马倥偬，时而与盟国相冲突，无论多么繁忙，遇到何等尖锐的矛盾，他总是觉得命运在他手里，但现在，他却感到眼前一片空白，第一次感到应该休息一下了。

1月14日，戴高乐从海滨回到办公室，向几位部长透露，他准备辞职。1月20日，部长们应召而来，戴高乐跟每个人握手致意后，宣读了他准备好的辞职声明。他说：“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复活了。我是不赞成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我所不能同意的、无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政治。我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尝试。因此，我只有告退。”

在差不多13年的第四共和国期间，戴高乐过着退隐生活，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等待着再一次的“召唤”。戴高乐不会甘愿就此沉默下去，他决心暂时以退为进。

戴高乐辞职虽然不是出于本愿，却也有如释重负之感。他的辞职在国内外没有引起多大波动。戴高乐由于战前在科龙贝教堂置办的房产被战火破坏了，需要重修，便暂时住在巴黎附近的马尔里。几个月后全家才在科龙贝安顿下来。在这

里，戴高乐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写完了战争回忆录，一共用了十多年时间，最后一卷《拯救》是当他 12 年后重返政治舞台的时候才完稿的。这是一部巨著，它足以和其他世界闻名的伟大回忆录相媲美。

当然，戴高乐也并不是完全关起门来写书，国内外的重大事件经常引起他的密切关注。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法国“政党体制”的抨击。在他辞职以后，三个主要政党——人民共和党、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主持了几个月临时政府的政务，共产党虽是第一大党，但是总理一职却由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轮流担任。在这几个月中，临时政府所作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起草新宪法。新宪法通过之日，也就是法国进入第四共和国之始。新宪法草案反复修改，终于把总统的职权限制到几乎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制宪权握在议会手里，各个政党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要能在议会获得应有的多数，就可以成为付诸实施的政策、法律或法令。

戴高乐保持了近半年的沉默后，1946 年 6 月 16 日，就法国政局发言了。他选择第一个从希特勒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城市贝叶作为他发表这一重要演说的地点，是别有遇意的。后来一提到“贝叶演说”，人们就立刻想到戴高乐辞职后的第一次公开声明。他认为党派之争是法国政局动荡的根源。指出“行政权应该由超越各党派的国家元首授与政府”，国家元首由包括全体议员在内的范围更广泛的选举团选出，他“既是法兰西联邦的总统，又是共和国的总统”，国家元首的职责是负责任免人员，颁布法律和公布法令，主持政府会议，裁决意外的政治事件，在国家危急时期保证国家的独立和批准法

国签订的条约。戴高乐在“贝叶演说”中勾划出了他将来主持第五共和国时的政体。

但是，没有人理会戴高乐的主张。第四共和国宪法草案在1946年10月获得了公民投票的多数通过。那只是一个微弱的多数：九百多万张赞成票，将近八百万张反对票，弃权票达八百多万张。这些数字说明，分歧很大，第四共和国不可能太平。

经过各党派的反复磋商，社会党的樊尚·奥里欧当选为第四共和国总统，另一个社会党人保罗·拉马迪埃出任总理。第四共和国在风雨飘摇中于1947年1月诞生了。这时，戴高乐感到，他非常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否则他就没有参予政权的角逐力量，尽管他在抗战中受到各抗敌运动的拥护，但是现在他却连一根可以倚靠的支柱也没有。为了最后消灭“政党体制”，他需要建立一个旨在消灭这种体制的政党。2月2日，他对私人秘书克罗德·莫里亚克透露了这番心意，并授意说，这个组织可以叫“法国人民联盟”，有了这样一个组织，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者就可以有组织地参加竞选了。

戴高乐要组织政党的消息很快传到巴黎。事实上，戴高乐派的重要成员勒内·加比唐、雅克·苏斯戴尔等已经在积极活动了。一时传说纷纷：戴高乐很可能在酝酿一次推翻现政府的政变。拉马迪埃总理于4月1日亲自到科龙贝对戴高乐进行了一次秘密拜会，他们交谈了两个小时。戴高乐对拉马迪埃说，他绝不支持第四共和国，他将是现政府的反对派，因为它的宪法保证不了法国的荣誉。但是他也绝对不会干出法律所不容许的事。这意思是叫拉马迪埃放心，他不会搞政

变，他想作的无非是通过选举重返政治舞台，虽然他从原则上是反对搞政党政治的。

过了几天，法国人民联盟征集成员的消息不脛而走，联盟在巴黎的办公室整日应接不暇，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约一百万份申请书。

科龙贝教堂的环境很幽静。戴高乐全家的生活并不阔绰，他们过着普通庄园主的生活，在拉布瓦瑟庄园，戴高乐一家经营了一英亩的田园。戴高乐暇时可以登上阁楼远眺如画的景色，可以在花丛之间悠闲地散步……

这位将军在紧张地从军务政 30 年之后确实是“归田”了，但是却并没有“解甲”。他可以比较从容地考虑一些问题，让那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凭借法国人民联盟这个政治组织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宣传“贝叶演说”提出的纲领。戴高乐间或公开发表些意见，举凡这一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诸如“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问世、北大西公约组织的诞生、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辩论、印度支那局势的演变，等等，都引志戴高乐的评论，他要以旁观者身份发发议论。但是，在他退隐的十来年中，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对东西方关系的看法、对于法国应该在世界上占据什么地位，形成了一整套观点，一旦重新执政，就可以很快地成为法国独立的政策。

在第四共和国整整 13 年中，戴高乐一直是冷峻地观察着，他断定第四共和国必将在政党的纷争中垮台。确实，第四共和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一天安定。内阁总理的职位马不停蹄地从这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的手里。

50 年代以后，法国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走上了恢复和

发展的轨道。可是政局却始终困顿不堪，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它的背上压着两个最大的殖民侵略战争。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已经把法国拖得精疲力竭。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促使法国政府加紧了议和的步伐，孟戴斯—弗朗斯接替拉尼埃尔出任总理，他向议会发誓，如果到7月20日战争还停不下来，他甘愿辞职以谢国人。形势是紧迫的，孟戴斯—弗朗斯终于在7月20日即将过去的深夜宣布达成了停火协议。印度支那战争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两年后，法国又投入了另一场殖民战争。这一回是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在战争正酣之际，法国社会党人居伊·摩勒主持的政府于1956年10月还和英国政府一起发动了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

侵略战争使国库陷于枯竭。居伊·摩勒决定增加税收来为阿尔及利亚战争筹款。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摩勒政府便于1957年5月倒台。接替摩勒出任总理的是激进党人布尔热—莫努里，新政府也只有十个星期的寿命，也因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了。

国内人心浮动：进步力量要求尽快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极右派殖民主义者则嫌政府对民族解放运动镇压不力。此时无论哪个政党出面组织政府都将面对各种压力，阿尔及利亚问题使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立足。

7月30日布尔热—莫努里政府倒台后，法国陷入了长达35天的内阁危机。几经周折，人民共和党的费利克斯·加亚尔被推出来组阁。这时国库已经告急，加亚尔一方面从法兰西银行借款2000亿法郎，另一方面争取到大量美元贷款。这些应急措施无非是饮鸩止渴，无底洞是填不满的。加亚尔政

府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面前依然束手无策，被迫于1958年4月15日下台。病入膏肓的第四共和国，根本无指望看到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

法国政坛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能够稳住局面：除共产党以外的各个政党几乎都试验过了，并都已失去了信心。法国总统勒内·科蒂物色下届内阁总理成了难题，到5月9日才找到了人民共和党的皮埃尔·弗林姆兰。在风雨飘摇中受命组阁的弗林姆兰，未卜先知地感到，他的运气肯定不妙。果然，代表极端殖民主义利益的右翼军人抵制他，因为他在一篇发表在《阿尔蒂斯消息》的文章中吞吞吐吐地谈到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极右派连弗林姆兰那样含糊其辞的见解也不能容忍。

弗林姆兰作了第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政界中要求戴高乐再度出山的呼声愈来愈高，局势需要一个铁腕人物。

第四章 光辉篇章——大国地位

法国政府的处境日益困难，长期的殖民战争使国库空虚、国内反战之声迭起、国际谴责之声日盛。继印度支那战争之后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威胁着第四共和国的生命。

在法国，从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战争以来，很明显地有两种政治力量反对第四共和国的政体。第一种政治力量主要是在阿尔及利亚有直接殖民利益的殖民者及其政治代表，殖民军队的头子也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政治力量就是以法国人民联盟为代表的戴高乐主义者。这两种政治力量的共同点是：第四共和国没有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需要有一个铁腕人物扭转和掌握法国的政局。第一种政治力量的声势很大，但是没有有威望的领导人。于是，反第四共和国政体的力量便都瞩目于戴高乐。戴高乐主义者同白人殖民者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一般也主张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分。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的雅克·苏斯戴尔便是坚决主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种殖民主义口号的，在阿尔及利亚的白人殖民者当中很有些威望。苏斯戴尔从阿尔及利亚回到法国后就积极活动，准备在局势出现危机时组织一个“公共安全紧急政府”，推戴高乐出来收拾局面。

戴高乐本人退隐后全部时间蛰居科龙贝，深居简出。戴高乐派的头面人物在政坛上却是十分活跃。人民共和党的费

利克斯·加亚尔组阁，国防部长就是著名的戴派政治家雅克·沙邦—戴尔玛。沙邦—戴尔玛曾经委派前抵抗运动成员雷翁·德尔贝克作为他的特使，到阿尔及尔活动，为戴高乐再次出山作舆论准备。德尔贝克在阿尔及尔进行了广泛的联络工作，宣传只有戴高乐才有威望和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德尔贝克回国后，不仅向沙邦—戴尔玛汇报了接触的情况，而且也向戴高乐的私人秘书奥利维尔·吉夏尔作了报告。他还对戴高乐本人谈过他到阿尔及尔进行活动的情况，并且说，阿尔及尔的军政领导人都期待戴高乐东山再起。戴高乐未置一辞，但是并没有表示不赞成德尔贝克的活动。

戴高乐的态度是审慎的，时机不十分成熟，绝不轻易表态。1957年初，他对莫里斯·舒曼说：“我再也不会重新上台了，永远也不。”莫里斯·舒曼向戴派议员米歇尔·德勃雷谈了这件事。德勃雷是很了解戴高乐的，便对莫里斯·舒曼说：“如果他对你说 he 永不再上台，那他是希望你说出相反的话。他所想的是另一回事。”

加亚尔政府又是一届短命内阁，在1958年4月因轰炸突尼斯边城萨基埃而倒台。科蒂总统在内阁危机中想到戴高乐，于5月5日派遣加纳瓦尔将军与戴高乐的侍卫官德·博纳瓦尔上校和法国人民联盟的雅克·弗卡尔私下会晤，试探戴高乐是否愿意受命组阁。戴高乐回答说：“为时尚早”。同时他也让科蒂明白：他不愿意同现在的议会一起治国，他需要的是特别权力，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独自行使政府大权，作出决定。

弗林姆兰内阁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几天的功夫便宣告

垮台。阿尔及尔的右翼军人和白人殖民者早已紧锣密鼓地策动推翻第四共和国。戴派首领也在巴黎紧张地活动。5月12日，米歇尔·德勃雷、雅克·弗卡尔、奥利维埃·吉夏尔等戴高乐主义者在巴黎聚会，决定到适当时机即派苏斯戴尔飞往阿尔及尔。但苏斯戴尔认为事关重大，行事之前必须请示深居科龙贝的戴高乐。戴高乐的表现则有些令人莫测高深，没有明确的态度，只是说：“让苏斯戴尔看着办吧，我不想过问这类事了。”

5月13日，阿尔及尔从清晨起，气氛就格外紧张，月晕而风，预示着要发生一些异乎寻常的事情。殖民者中的极右团体以各种名目出现，招摇过市，准备借口三名法国士兵被杀指责法国无能，进而要求成立军人政府。示威者的行进目标是占领总督府。

5月13日刚过中午，商店就急急忙忙关上了大门，街上出奇的安静，不时走过一批一批的人群。有的声嘶力竭地喊叫：“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让军队执政！”，“科蒂辞职！”，“把本·贝拉送上绞架！”，“布尔吉巴是刽子手！”，“苏斯戴尔，苏斯戴尔！”，偶尔地也有人喊几声“戴高乐，戴高乐！”。

下午5时，高音喇叭响起来了：“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突尼斯杀害的三名法国士兵的真正凶手，并不是叛匪而是那些很久以来支持杀人凶手的法国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无论当前政体的所有政府发出什么命令，我们都将看作一钱不值。现政府是个无所作为的政府。谁也不会听它的，谁也不会再服从它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一个公共安全政府。”

大约下午 6 时，示威者迫近总督府，横冲直闯，很快占领了整个大楼。玻璃窗被砸碎，家具被捣毁，纸片横飞，一个半世纪的文书档案被扔得遍地都是……半个小时过去了，总督府一副遭劫的样子。混乱中，时时可闻火药爆炸的声音，警卫施放了催泪弹。

混乱稍微平息了一些，殖民当局的军政要员萨朗、马絮、儒奥、阿拉尔等聚在一起，准备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总督府的楼顶上升了法国的三色旗。当这些人来到总督府时，忽然，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空降司令马絮将军，扯着喉咙喊了一阵：“马絮万岁！让军队执政！”马絮神情紧张，急促地走进大门。这时是 7 点 30 分。

晚上 8 时 45 分，马絮出现在阳台上，当众宣读了一份匆忙起草的声明，宣告公共安全委员会成立，由马絮担任主席。当晚，委员会给戴高乐拍了一封电报，呼吁他“把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手里”。

深夜的巴黎，国民议会正在就被阿尔及尔的示威者称为“无所作为”的弗林姆兰政府组成问题进行投票。从法律上讲，弗林姆兰政府还在那里，但是已经没有人认真地看待它了。

阿尔及尔的总督府门前，一直聚集着人群，等待着戴高乐的答复。戴高乐这几天曾在巴黎逗留了片刻，有人劝他在阿尔及尔的示威活动正在势头上的时候及时应命，只要他登高一呼，政权就可以到手，但他还觉得不到火候。

5 月 15 日，戴高乐决定打破沉默，下午 5 时，记者们在戴高乐的巴黎的办公室里，听到了一个来自科龙贝的只有七行的简短声明，说国运的衰微是民族灾难的根源，政党体制

应该对这种局面负责，为了救亡图存，他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救亡图存”，戴高乐断定，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现在是另一个 1940 年 6 月。

戴高乐决定出山。极右派殖民主义军人不停地鼓噪骚动，他们声言拥护戴高乐主持国事，其实是希望借戴高乐之手实行极端殖民主义政策。他们实际上是一批法西斯暴徒，为了在法国推行军人专政政体，还策划“复兴行动”，准备把暴乱引向法国本土。

巴黎的空气十分紧张，台上的弗林姆兰政府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可能倒台。政界人士对于戴高乐重返政治舞台莫衷一是，局势是不明朗的。人们从阿尔及尔的暴乱分子打出拥护戴高乐的旗帜，从苏斯戴尔摆脱警察局的监视前往阿尔及尔，从戴高乐一向谴责政党政治、反对第四共和国宪法等情况中，本能地把戴高乐重新执政同个人独裁联系起来，同在阿尔及尔发动暴乱的殖民主义分子联系起来。人们等待着戴高乐预告的、将于 19 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焦虑地希望了解戴高乐所说的他将准备掌握共和国的权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法国共产党反对戴高乐再次出山，社会党的多数也如此。但是社会党领导人居伊·摩勒和樊尚·奥利欧却支持戴高乐，不过他们要求戴高乐在第四共和国宪法许可范围内重掌政权，要求他谴责那些制造暴乱的殖民主义军人。

戴高乐 19 日的记者招待会是在巴黎道赛宫举行的。大厅里，新闻记者们熙熙攘攘，挤得水泄不通。塞纳河两岸布满宪警和士兵，遵照内政部长儒尔·莫克的命令，把招待会大

厅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但是，始终秩序井然，没有任何骚乱。

戴高乐来到会场，除了他的侍卫官博纳瓦尔上校和一位司机以外，别无其他随从。当他看到政府竟动员了长龙般的装甲车时，不禁感到好笑，好像他带领一支突击队要夺取公区建筑物一样。他暗自确信，使共和国恢复平衡，此其时矣！于是，戴高乐以“时代的主人”的姿态向记者们说，他用不着谴责5月13日事件，既然连政府也没有这样做，何况那些暴乱者已经平息下去了。他表示他已作好准备去恢复国家的权威和民族自信，这就是他所说的“掌握共和国权力”。最后，戴高乐说：“我现在还将回到我的村庄去，并且将在那里听候国家的调遣。”会后，戴高乐立刻返回科龙贝。

戴高乐并没有只是等待。5月23日，他致电萨朗将军，要求他派人到科龙贝来向他报告一下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极右派还正在准备着“复兴行动”，放出风声说，只要戴高乐赞成，他们就于5月27日在巴黎动手。

5月26日，戴高乐秘密约见弗林姆兰总理。弗林姆兰承认他完全控制不了阿尔及尔的局势，希望戴高乐约束殖民军队的将军。戴高乐表示同意，同时明确提出，既然弗林姆兰自己也承认无能为力，那就应该辞职。第二天，戴高乐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开始“为建立一个能确保国家的团结和独立的共和国政府而采取必要的正常程序”，因此，他不赞成任何危害公共秩序的行动。戴高乐在声明中还说：“我期望驻在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部队模范地服从他们的首长萨朗将军、奥伯瓦努海军上校和儒奥将军的命令。”

5月28日，萨朗的代表杜拉克将军来到科龙贝，向戴高乐报告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杜拉克说，萨朗认为，如果戴高乐不尽快掌握政权，殖民军的最高司令部就无法阻止极右派军人率众向法国本土实行“复兴行动”。杜拉克回去后向萨朗作了汇报，萨朗立即通过广播说：他已经与戴高乐取得了联系，戴高乐切望目前不要采取任何像“复兴行动”那类举动，拟于30日发动的“复兴行动”暂时取消，决定待“伟大的夏尔”遇到困难时再举行。

同一天，科蒂邀请戴高乐出面组阁。29日，科蒂把请戴高乐主持组阁一事通知国民议会和参议院。30日，弗林姆兰政府辞职。

戴高乐在议会就委任他组阁进行投票以前，在科龙贝接见了居伊·摩勒和樊尚·奥利欧，对他们说，他执政后将效忠共和国和民主自由。

在戴高乐政府里，社会党的居伊·摩勒担任了副总理，刚卸任的总理弗林姆兰也加入了内阁。

戴高乐政府还是第四共和国宪法范围内的政府，所以从法律上讲，这才是真正的第四共和国最后一届政府，虽然戴高乐决意要彻底埋葬第四共和国，并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了。6月1日，戴高乐在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时，要求给予他解决阿尔及利亚时局的特别权力，授权他起草交全民讨论的新宪法。戴高乐获得了329张赞成票，224张反对票，32张弃权票。

戴高乐终于通过合法手段取得了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特别权力，而新宪法一旦为国人所接受，第四共和国就将寿

终止寝，第五共和国便将应运而生。

戴高乐重返政坛后，立即着手三件大事：第一，起草一个加强总统职权的新宪法，以取代第四共和国宪法；第二，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其他殖民地问题；第三，振兴法国经济。

关于起草第五共和国宪法的工作，戴高乐指定坚决拥护戴高乐的德勃雷主持。德勃雷组织了一个精干的起草小组，以“贝叶讲话”的精神为依据，动手草拟新宪法草案，准备在四个月内提交公民投票。

6月4日，戴高乐飞抵阿尔及尔，局势基本恢复了平静，但是战争还在继续，极右派仍希望戴高乐成为他们的靠山。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逗留三天，他虽然也喊过“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但是他感到依仗武力镇压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让阿尔及利亚自决来选择与法国结合的道路。戴高乐觉得，他必须尽快地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否则军方就会利用一切借口延长战争。戴高乐派人在瑞士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秘密接触。后者坚持，谈判的结果必须是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而不仅仅是停战。谈判的时机虽然还没有成熟，但积极的试探已在进行了。极右派军人策动的暴乱为戴高乐的东山再起打开了通路，然而作为既是军人，更是政治家的戴高乐却决心不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提出的极端主张，决定不予支持。6月7日，戴高乐从阿尔及尔回国，到巴黎后，他马上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以外的殖民地问题。在6月13日的广播讲话中，戴高乐宣布法国政府正在考虑与“海外领地”建立某种新型关系的方案。

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为了加强新宪法草案的权威性，成立了一个以雷诺为首的委员会讨论和修改宪法草案，戴高乐本人也时时参加讨论。到8月14日，新宪法草案即公诸于世，准备9月28日议会暑假结束前的一个星期交付公民投票。如果新宪法获得多数通过，现在的国民议会就自然而然地宣布解散，新的选举便将举行。

同一天，法国的“海外领地”也要举行公民投票，决定这些殖民地是在“法兰西共同体”内行使一定的自治权，还是完全脱离法国而独立。戴高乐希望成立“法兰西共同体”，如果哪一个国家选择了独立，法国将和它断绝一切政治和经济联系。

9月28日，新宪法草案交付公民投票，取得了占选票数79.2%的多数票，在投赞成票的军政头面人物中，人们看到这些名字：第四共和国总统勒内·科蒂、戴高乐派的米歇尔·德勃雷、雅克·苏斯戴尔、沙邦—戴尔玛、乔治·蓬皮杜、勒内·加比唐、奥利维埃·吉夏尔等，人民共和运动的皮埃尔·弗林姆兰、乔治·皮杜尔、莫里斯·舒曼、独立党的安托万·皮内、保罗·雷诺、吉斯卡尔·德斯坦，时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社会党的居伊·摩勒、加斯东·德费尔、保罗·拉马迪埃，激进党的莫里斯·富尔、爱德加·富尔、费利克斯·加亚尔等，中间派的勒内·普利文。投赞成票的还有雷蒙·阿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安德烈·马尔罗等著名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有的本是第四共和国的显赫人物，这时虽然投了拥护戴高乐的票，但是不久就成为坚决的反对派，包括居伊·摩勒、乔治·皮杜尔等。

接着是重新选举国民议会和握有实权的总统。戴高乐改组了原来的戴派组织法国人民联盟，成立了具有政党性质的“新共和联盟”。

“海外领地”的投票结果也是戴高乐期待的：除了几内亚以外，所有法属非洲殖民地都成为在“法兰西共和国”内享有一定自治权力的成员国。戴高乐对选择了独立道路的几内亚，采取了惩罚性的措施：停止一切援助，召回法国官员，搬走了法国所占有的装备，连电话机也拆了……然而，在民族解放日益觉醒高涨的时代，从1959年起，“法兰西共同体”的非洲成员国陆续取得独立。戴高乐在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面前只得接受现实。

1958年11月，举行新宪法通过后的议会选举，戴高乐的新共和联盟在536席中赢得了206席。戴高乐对选举结果非常满意，因为新共和联盟当选的议员可以在“右派”、“各式各样的‘中间派’”以及“大为削弱的‘左派’”之间形成“一个相当结实而坚定的核心”，成为戴高乐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12月1日，由参众两院议员、省市议员、市长等组成的总统选举团选举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以多数票当选。

第二年1月8日，戴高乐驱车前往总统府就职。前任总统勒内·科蒂在总统府迎候他，庄重而激动地说：“法国人中的头号人物现在成为法国的头号人物了。”随后，两任总统并肩乘一辆敞篷车前往凯旋门，履行向无名烈士致敬的例行仪式。

陪同戴高乐前往凯旋门的还有第五共和国的其他领导

人：参议院议长加斯东·莫内维尔、国民议会议长沙邦—戴尔玛、第一任政府总理米歇尔·德勃雷，还有十多年后当选为总统的、时任戴高乐内阁办公厅主任的乔治·蓬皮杜。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就这样诞生了。

第五共和国的诞生，在法国战后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结束了动荡近 13 年的第四共和国。虽然，戴高乐于此时受命，但并不轻松。如果他不能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使政局相对实现稳定，他仍然不可能站住脚。戴高乐是人心思定的时候重新上台的，他决心充分利用这一基本条件，大胆而又谨慎地踢出他的“头三脚”。

戴高乐有了新宪法赋予他的自从 1789 年以来，或许只有拿破仑曾享受过的特殊权力。戴高乐是反对“政党政体”的，他认为，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之所以充满倾轧和冲突，主要原因是政党林立，相互攻击，结果把一个民族的活力抵销掉了。法兰西民族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伟大人物，把民族命运、国家命运牢牢地抓在手里。但时至今日，戴高乐无法摆脱多党制，各政党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只能承认它。戴高乐明智地顺应了客观现实，以坚定的戴派米歇尔·德勃雷、沙邦—戴尔玛为基本班底，尽可能地扩大团结的范围，把主要政党吸收到政府里来。例如号称中间派的安托万·皮内，社会党的居伊·摩勒等。戴高乐有意识地减少个人专断的色彩，有意识地树起了法国人民所一贯珍视的民主、自由和共和的旗帜，以使人们感到，戴高乐既是强有力的领袖，又是法国民主传统的继承人。

戴高乐从弗林姆兰手里接过政权时，国库已经枯竭，情

况异常紧急，外债超过 30 亿美元，其中一半又必须在一年之内偿还。1958 年 6 月 1 日，黄金和外汇储备只有 6.3 亿美元，只够维持 5 个星期的进口贸易。当时可以倚靠的只剩下年初从国际货币基金借来的 5 亿美元。

戴高乐迫在眉睫的事就是为枯竭的国库找到财源，而不能靠滥发钞票。戴高乐根据安托万·皮内的建议于 6 月 13 日在电视广播中宣布发行国内公债，同时冻结工资 12 个月。这个紧急措施很快使国库状况有所缓和，到 7 月 12 日止已回收了 3240 亿旧法郎和相当于 1.7 亿美元的黄金。接着，戴高乐着手改造旧法郎，为了提高法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决定发行新法郎，以 1:100 的比率收回旧法郎，同时宣布法郎贬值 17.5%。戴高乐政府还决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从 1959 年 1 月起，90% 的产品将用于国际交换。

这些非常措施自然会影响国民的收入，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表示坚决反对，居伊·摩勒因此辞去了政府副总理的职务。然而，戴高乐确信这是唯一可以使国库免于崩溃的办法，只要先缓过这口气，法国经济就有希望摆脱传统的保守、被动而分散的状况，走向发展、高生产率、有竞争力和集中。戴高乐为第五共和国规划了一个国家和私人投资并举、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发展原子、航空、空间等尖端科技的经济振兴纲领，以便使法国经济发展赶上“世纪的速度”，胜任“国际上的竞赛”。

要实现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最关键的是必须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戴高乐决心要割掉这颗毒瘤。但又不是举手之劳的事。戴高乐的东山再起，很大程

度是“五·一三”事变促成的；是在极右派军人制造的混乱气氛中、其他执政党束手无策的形势之下，应运而生的。

戴高乐与这批极右派军人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即他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很早就想根据阿尔及利亚的现实来寻求解决方案。“五·一三”的“英雄们”为戴高乐重新执政提供了机会，但是，戴高乐没有听任他们驱使。

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在电视广播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在阿尔及利亚实行“自决”的问题。他说，“通过阿尔及利亚人自己的自由选择来决定他们的前途”是“唯一应当采取的办法”。1960年9月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说：“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在发展中，它在前进着，这就是说，这是一个靠阿尔及利亚居民决定其命运的阿尔及利亚，一个由阿尔及利亚人管理自己事务的阿尔及利亚。”1961年3月30日，法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时宣布，双方将在瑞士埃维昂举行停战谈判。1962年3月18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同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在公民投票中以99.7%的绝对多数宣告独立。随后，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至此，阿尔及利亚通过不懈的斗争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地位，走上了独立的道路。

60年代初，西非和北非的几乎全部原来法属殖民地都已先后宣布了政治上的独立。戴高乐在回顾法国殖民史在自己手里终结时，心情也许是复杂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的理想是：打败希特勒后恢复“法兰西帝国”的“完整性”，那时戴高乐未料到处于法国长期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

会如此迅猛地觉醒，掌握自己的命运。几十年过去了，世界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一位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戴高乐审时度势，毅然抛弃了昔日“法兰西帝国”的思想，理智地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选择。戴高乐在回顾法国殖民地发生的深刻变化时不无感慨地写道：“殖民地的终结是我国历史当中的一页。在翻过这一页的时候，法国既对过去的事情感到遗憾，也对行将到来的事情充满希望。”

当过法国外交部政治司长、驻英国大使的雅克·德·博马舍在1970年曾听到过毛泽东主席对戴高乐的一段评价。毛泽东主席对来访的法国客人说，他认为戴高乐之所以堪称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是”，什么时候该说“否”。他说，戴高乐在1940年抵抗了纳粹，1962年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作出让步——这在当时还没有第二个政治家能够既做这件事也做那件事的，戴高乐则正因此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法国所建立的政体能够代代相传的缘故。贝尔纳·路德维支在他的著作《戴高乐》中引用了博马舍亲口向他转述的这些话，认为，毛泽东主席对戴高乐的评语是最恰当不过的。

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后，戴高乐有如卸掉了背上一只沉重的包袱，他可以在国际风云中放手地为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进行搏斗了。

戴高乐要恢复法国在战争中失去的世界大国地位，进一步使法兰西民族重放历史上的光辉。萦绕在戴高乐脑际的是：烈女贞德的爱国主义，路易十四鼎盛的波旁王朝，使法国的声威震撼了古老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帝国。然而，戴高乐从诞

生之日起从来不曾见过这些令人骄傲的日子。戴高乐只能从“圣母院的夜景”、“凡尔赛宫壮丽的黄昏景色”、“阳光照耀下的凯旋门”、残老军人院穹顶下“瑟缩地颤抖着”的敌军军旗中领略历史上的法兰西何等声振天下！

戴高乐不甘心自己的祖国就这样黯淡无光；他不相信法兰西不能在世界上重放异彩。命运在向法国挑战，戴高乐要扼住命运。1944年他虽然作为胜利者凯旋巴黎，但是那一次他没有能战胜政党角逐的漩涡。1958年给他带来了机会，他在科龙贝教堂别墅稳坐钓鱼台，自有人请他出山。戴高乐在优先解决使法国陷于四面楚歌的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同时，刻不容缓地为法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进行斗争。

戴高乐认为，法国必须制定独特的外交战略。他在《希望回忆录》里写道，他的宏图并不是要把法国从大西洋联盟中拉出来，而是要撤离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法国要和东方集团，首先是和苏联建立一种“缓和、和解和合作”关系；条件成熟时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用强大的核力量把法国军队武装起来。戴高乐说，他决计“一步一步地”走，每一段路都同总的形势的演变结合起来，而不影响法国同其他国家的“传统友谊”。这就是戴高乐要做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拥有法国的独立核力量和大西洋联盟中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

戴高乐重掌政权后在马蒂尼翁大厦接待的第一个来客，是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因此麦克米伦是第一个正式听到戴高乐亲口阐明法国立场的人。戴高乐对麦克米伦说，法国下决心制造自己的核武器，应该成立一个由西方主要国家分享控

制权的原子武器小组，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法国都应有权参与。戴高乐还提出北约组织也应该由美英法三国共同领导，而不是由美英构成的“两头领导”来掌握北约的领导权。

1958年7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来到巴黎，他对戴高乐说，美国知道法国正在制造原子武器，与其法国花那么多钱自己去搞试验，不如由美国提供现成的原子武器，岂不是更好么？戴高乐回答说，假如美国肯卖，法国当然愿意买；但问题是，美国能够答应这些武器一旦卖给法国就完完全全、毫无限制地属于法国么？戴高乐的反问切中要害，杜勒斯没有办法正面回答。因为美国根本就不打算帮助法国拥有原子武器。这是双方心里都清楚的。杜勒斯来到巴黎的前两天，美国政府刚发布了新原子能法案，规定，美国只向已有“实质性进展的盟国”提供核技术资料。美国心目中“实质性进展的盟国”只有英国一家，法国并不在内。

戴高乐对美英在北约的所谓“两头领导”的挑战，是在9月14日给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信中正式提出的。戴高乐在信中说，鉴于法国在安全问题上承担的责任，它应当直接参与大西洋联盟的政治和战略决策；而这类问题却只限于美英两家共同决定；随着原子武器的垄断权将不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更有理由加入北约的最高权力集团。戴高乐提出，联盟的领导权应该属于三家，否则，法国就不再为北约的发展负责，并根据条约的第十二条保留对北约进行改造或退出的权利。10月28日，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戴高乐的用意只在于指出，在涉及北约组织的事务上，英美法三国应该先举行磋商。但是，舆论界看得很清楚，戴高乐建议

的核心，是要在北约理事会内确立一种“三头政治”的领导体制。

美英先后拒绝了戴高乐的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答复戴高乐说，美国承担的责任要比法国重得多，它要承担全球的责任；如果组成“三头领导体制”，又怎能说服北约其他成员国呢？艾森豪威尔提出的理由取得了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同年12月在北约部长理事会会议上，戴高乐的建议被否决。

戴高乐一旦下了决心，就绝不会停步不前。1959年3月，他下令收回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指挥权，从此这个舰队从北约撤出。6月，法国政府拒绝在法国领土上部署美国的核武器，除非这些武器的主权属于法国。

9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赫鲁晓夫将访问美国之前来到西欧。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在巴黎进行了一次“摊牌”式的会谈。

两位总统首先谈到了对苏联的战略问题。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不想挑起战争，迟早要和苏联达成一些协议。最近，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了苏联，不久，赫鲁晓夫要到美国来，美国的意图是竭尽全力同他们进行建设性谈判。从艾森豪威尔的话音里，戴高乐觉得，美国总统满脑子考虑的都是美苏关系问题，似乎宇宙万物都要围着它转；在西方阵营中最重大的现实便是美国的现实，其他事物都只不过是次要的。

对于美国总是要摆出西方“盟主”的架式，戴高乐一向怀有本能的抵触情绪。戴高乐说，美苏两家在军备上达成某种技术性的谅解，固然可以起促进作用，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解决东西方关系中的一切问题；欧洲国家之间也应该在经济、

文化、技术、旅游等方面进行接触，其意义并不亚于美苏接近，东西欧之间加强交往倒可以切实地把“铁幕”一片一片地撕碎，逐渐地使扩充军备的狂热没有立足之地。戴高乐告诉艾森豪威尔：法国也打算邀请赫鲁晓夫来访，打算在实现全欧和解之前先在各种实际领域里实现法苏合作。

艾森豪威尔把美苏关系问题放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戴高乐则强调欧洲，首先是法国的独特作用。戴高乐并不认为，只要美苏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不在话下，他让艾森豪威尔懂得，美国没有权利包办西方所有国家的对苏关系事务。

艾森豪威尔把话题转向了核武器问题，他重提杜勒斯说过的话，美国可以向法国转让核机密，条件是法国同意美国享有控制权。

戴高乐依然坚持：由法国自己掌握这些武器，才会接受转让。他进一步提出，法国一定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和苏联都拥有彼此相互威慑的手段，但它们各自的盟国却没有这种手段，一旦打起来，谁能保准这些原子弹不落在欧洲战场上呢？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无论从地理、政治、战略上看，法国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是以前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的。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法国那么不信任美国，居然怀疑美国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欧洲联在一起这样的事实。

戴高乐反唇相讥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法国都是盟友，可是，法国不会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

国是在法国经受了三年濒于灭亡边缘的战争考验之后才参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也是在法国已被希特勒占领之后很久才卷进战争的。所以，一个国家可以“帮助”另一个国家，却不可能包办那个国家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法国不能接受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的安排，在核武器方面也必须在英美法三个核国家直接合作的范围内协调原子弹的使用和控制。艾森豪威尔说，搞原子弹很费钱，法国根本不可能赶上苏联的水平，因此也就谈不上法国原子弹的威慑价值。戴高乐反驳说，至于原子弹的威力，只需要扔几个就足以把任何什么国家毁掉了，所以，法国只要有能够杀死敌人一次的原子弹就够了，到那时，敌人纵使有十倍多的手段也已无济于事。

两人在会谈中没有一件事是谈得拢的，双方都亮明了观点。全世界都看在眼里：戴高乐正引导法国一往无前地走自己的路。

1960年3月23日至4月3日，赫鲁晓夫应戴高乐的正式邀请访问法国。赫鲁晓夫一家人都来了：夫人、两个女儿和那个著名记者、赫鲁晓夫的乘龙快婿阿朱别伊。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是针锋相对的，因此少不了唇枪舌剑。然而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却有不少汇合点。戴高乐在会谈时提出了著名的“缓和、谅解、合作”的三部曲政策和“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建设构想。

双方都表示要防止战争，缔造和平，承认德国的现状。戴高乐提出应该“在欧洲的范围内依次地推动缓和、谅解和合作”，因而“从大西洋直到乌拉尔在欧洲人之间建立起来往、

联系和那样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可以首先去掉德国和柏林问题的“毒瘤”，继而引导两个德国相互接近、相互配合，“最终把整个日耳曼民族纳入一个和平和进步的欧洲当中，使它得以作一番新的事业。”

从表面上讲，戴高乐和赫鲁晓夫有不少共同语言。事实上，赫鲁晓夫关于柏林问题的建议、苏联击落美国 U₂ 间谍飞机以及柏林墙问题等，戴高乐都是坚定地同美国站在一起的。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是，戴高乐在同美国闹独立的时候，竟然在同苏联领导人会谈时大肆强调“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显然，美国无论如何都不属于这个欧洲的范围之内。法苏接近使西方舆论界联想到了 19 世纪的法俄联盟，美国则感到了一种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的不祥之兆。因为那意味着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将发生动摇，起码不能仍像战后初期那样。戴高乐要作什么事情，是绝对不需要美国批准的。

第二年 4 月，戴高乐回访华盛顿。在抵达美国之前，戴高乐先到加拿大。他对迪芬巴尔总理说，法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并不屈服于它的霸权。法国要把加拿大当作在美洲的好朋友，愿意增加法国在加拿大的工业、科技和文化方面的投资。他还说，法国将反对“把加拿大吞并的任何前景”。他还说，尽管大西洋条约把加拿大和某些核计划联结在一起，他依然希望加拿大也支持法国的计划，法国准备大大地密切同加拿大的关系。

戴高乐在美国的大门外如此这般地说，对美国无疑是一个刺激。但他向迪芬巴尔总理议论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语居民

“自决”问题，则不能不引起加拿大的强烈情绪。据戴高乐事后追述，访问魁北克时，他听到街上有人喊“法国万岁！”和“戴高乐万岁！”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笔锋虽含蓄，但仍掩饰不住得意之情，戴高乐的大法兰西民族主义在大洋彼岸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五年后的7月，戴高乐又来到魁北克，再也克制不住那股不管不顾的古怪情绪，在蒙特利尔市政大厅阳台上即兴演说时，竟然高喊起“自由魁北克万岁！”来。将军老矣！这可不是年事过高的人一般会有失言和失礼，而是在东道国的领土上对东道国的挑衅。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在为此召开的内阁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加拿大政府无法接受戴高乐的举动。于是戴高乐中止了访问，没有去首都渥太华就返回巴黎了。

戴高乐于1960年4月22日到华盛顿，法美双方已经在不少重大问题上亮了底牌，所以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事情。双方仍重复各自的观点：艾森豪威尔还是艾森豪威尔，戴高乐还是戴高乐。戴高乐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将致力于同苏联的“双边缓和和合作”，并且企图使之具有欧洲意义，逐渐地使莱茵河、多瑙河和维斯图拉河流域的全部地区在“集团和霸权”之外都建立起这种缓和和合作的气氛。

戴高乐从美洲回来后决定为争取“三头政治”领导体制作最后一次努力。他不满足于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关于在重大问题上同法国磋商的承诺，要求堂堂正正地、昭示于天下的美、英、法在北约内的同等地位。8月9日他再次致函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提议9月在百慕大举行三国首脑高级会议，以讨论与建立三国合作体制的有关问题。9月初，戴高

乐收到艾森豪威尔的一封长信，原则上同意举行高级会议，但建议12月再举行。此外，他在信中逐一批驳了法国的论点，根本无意接受三国体制的建议，表示：如果法国在拟议中的三国高级会议上以欧洲大陆的发言人自居，那就会削弱美国 and 联邦德国的密切关系，美国是绝对不赞成的。麦克米伦的复信短得多，也是表示原则支持，也是说可以考虑在12月举行这样的会议。戴高乐从中再次看到英美“特殊关系”的作用，如果举行这样的会议，又有什么意义呢？戴高乐兴趣索然了。

当时，在非洲的心脏原比属刚果，美国率领的“联合国蓝盔部队”以维持秩序为名开了进去，实际上扮演着镇压刚果民族独立运动的角色。法国认为，美国在干这件事之前，根本没有同对非洲有极大兴趣的法国商量，它是表明美国并不把法国放在眼里的又一个事例。

1962年年中，戴高乐到法国中部视察期间，在利莫日发表重要演说，他强调说，法国在履行其对北约义务的同时，不会让任何别的国家牵着鼻子走，它将在联盟内部实行自己的“意愿”、“行动”和“政策”；法国的目标是“建设我们的欧洲”，而不再是“两个大国”的欧洲。

戴高乐断定，美国绝对不可能允许法国与美国同等地分享在大西洋联盟的领导权。当然在美国看来，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也绝对不会安于联盟中的从属地位。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北非，曾亲眼得见戴高乐在“流亡”中尚且不屈服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压力和劝诱，何况今天他已是经济上正在起飞、实力正在增强的独立的共和国总统呢！

1962年3月，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达成了停战协定。戴高乐可以轻装前进了。这一年的10月28日，戴高乐在公民投票中，又取得了一次胜利。戴高乐作为共和国总统，将向全国公民负责，而不只是向一个由参众两院、省市议会组成的选举团负责了。戴高乐作为总统的权威性更加提高，起码在选举方式上体现出总统是超党派的和超议会的领袖。

1963年1月，法国否决了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第一次申请。戴高乐认为，如果把英国纳入欧洲共同体，将不啻在共同体内安插了一匹美国的“特洛伊木马”，他曾经亲自向麦克米伦发问，英国既然同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而且又可以从广大的英联邦特惠区买到廉价的农副产品和原料，它怎么能够安分守己地作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呢？戴高乐直统统地问麦克米伦：“你们一直吃的是廉价的加拿大小麦、新西兰羊肉、爱尔兰牛肉和马铃薯、澳大利亚的牛油、水果、蔬菜、牙买加的糖等等，现在你们愿意购买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么？”戴高乐对英国毫不留情，他否决了麦克米伦政府的第一次申请，四年以后又否决了威尔逊政府的第二次申请。

戴高乐一方面排斥英国，另一方面则争取联邦德国。在戴高乐的外交战略中，法德关系问题占据着重要地位。既然德国已经一分为二，历史不会允许再出现另一个俾斯麦或希特勒，为什么法国不能同毗邻的联邦德国结成同盟，以推动西欧联合的车轮呢？戴高乐感到，法国在欧洲的事业，可能需要倚靠同联邦德国的紧密合作关系来实现。因此，他迅速、

全力地改善同联邦德国的关系。阿登纳看穿了戴高乐的心思，同时也确信联邦德国绝不能没有一个友好的、可以相互倚重的邻居。戴高乐和阿登纳在 1958 年 9 月，即戴高乐重新上台不到四个月，在朗布伊埃开始构筑法德联盟的大厦。以后，法德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书信往返，直到 1963 年初，戴高乐和阿登纳在巴黎签订了全面合作的法德条约。

法德的合作关系，对于奠定西欧联合的格局，意义十分重大。戴高乐和阿登纳为他们身后的历届领导人作出了样子，在涉及西欧的重大问题时，法德两国总是先进行磋商。当然法德关系并非亲密无间，更非没有分歧。例如，联邦德国绝不愿意为了法德友谊而损害德美关系，也不赞成法国一味把英国关在欧洲共同体的门外。

1963 年 6 月，翅膀硬起来的法国决定把它的大西洋舰队从北约撤出。7 月 29 日，戴高乐宣布，法国将不在苏、美、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继同年 1 月拒绝参加肯尼迪“多边核力量”建议之后，再一次表示法国的独立核力量不属于超级大国操办的任何“核俱乐部”。

此后，戴高乐加紧了撤出北约军事组织的步骤。

1965 年 5 月，法国宣布将不参加北约的军事演习。9 月 9 日，戴高乐举行就任总统以来的第十二次记者招待会，就国内外政策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谈到北约问题时，戴高乐第一次暗示法国可能于 1969 年退出这个组织，他说，最迟到 1969 年，那种在“一体化”名义下把法国的命运交给“外国当局”的“从属关系”就将结束。

1966 年 2 月 21 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明确

提出，法国将从北约军事组织撤出。他说，如今同当初以北约的名义建立起美国“保护体制”时的形势大不相同了，苏联已不对西欧构成威胁，在欧洲打仗的前景是很渺茫的。同时，自从苏联有了可以直接打击美国的手段以来，美国对苏联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更小了；美国卷入越南等地区的冲突大有扩展之势，甚至会把欧洲也卷进去，尽管欧洲极不情愿；如果法国的领土、武装力量、空军基地和港口，仍然通过北约置于美国的指挥之下，法国就难免被裹进去。戴高乐宣布，法国将从现在起到1969年4月4日北约诞生20周年止的这段时间里，对于北约的合作关系的现行措施进行反复研究，以便“重建起某种尊重主权的正常局面”，使法国所属的“土地、天空、海洋和武装力量”都只接受法国的管辖。他解释说，这并不是法国准备与北约实行“决裂”，而是对新形势的“必要的应变”。

美国马上就领悟了戴高乐的意思，第二天，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国会说，美国必须有思想准备，当法国不再参加大西洋联盟的活动的时候，美国就需要同北约的其他13个盟国担负起北约的全部防务。

3月7日，是戴高乐把酝酿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日子。戴高乐给美国总统约翰逊写信，同时也给英国首相威尔逊、联邦德国总统艾哈德和意大利总统朱塞佩·萨拉盖特发了内容相同的信，提出，法国政府决定在本土充分行使主权，将不再参加北约“联合”司令部，因此也不再向北约提供部队。

四天后，法国外交部把上述决定以照会形式正式通知了北约的14个成员国。事已至此，事态是无可挽回了。戴高乐

的决策，是他几十年来在国际政治风云中为法国的民族荣誉奋力搏击的产物。这一年，戴高乐是 76 岁的老人了，他那睥睨一切的独立风格得到了登峰造极的体现。29 日，在发给北约所有成员国的备忘录中，法国政府列出了如下一张日程表：

——1966 年 7 月 1 日起，法国的驻德陆空部队不再受北约司令部管辖，但仍将根据 1954 年 10 月 23 日关于外国军队留驻联邦德国领土的条约，继续驻扎下去。同一天，法国人员从北约司令部撤走。

——7 月 23 日，法国在北大西洋防务学院的高级人员和学员在本学期结业后撤走。

——1967 年 4 月 1 日，北约最高司令部和中欧司令部总部从法国领土迁走。

美国曾经试图争取法国把北约两个司令部总部迁出法国的时限宽限一年，但未获准。

法美关系的温度基础大降低，法苏关系的温度则相应地大为上升。法苏关系以戴高乐正式访苏为契机达到了“高潮”。法国决定断绝同北约军事组织的联系三个多月后，戴高乐于 6 月 21 日至 7 月 1 日在苏联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和极高的礼遇。戴高乐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进行了政治会谈，发表了法苏联合声明，签订了贸易、文化规定和空间探索和技术合作协定。联合声明说，双方都认为，欧洲的问题首先应在欧洲范围内进行讨论；欧洲大陆的国家应该努力为东西方的缓和准备必要条件。双方还协议将在巴黎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直接通话的“热线”。

半年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回访法国，会谈后的联合声明说，缓和已经有了积极成果，它必将推动欧洲各国关系的改善，从而有助于解决国际争端。声明还说，双方讨论了召开一次全欧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可能性问题。

戴高乐访苏和柯西金访法，不仅大大地发展了法苏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而且使苏联多次提出的关于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倡议，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充分响应。

1966年，可算是第五共和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它使大西洋联盟绽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缝。

戴高乐的举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评论。西方的新闻记者以其特殊的敏感性，危言耸听地把戴高乐主义说成是“亲苏主义”或“反美主义”。这种简单化的概括从事物的现象来看，颇使人感到似是而非。然而，现象和实质每每不一致。须知，戴高乐的“缓和、谅解、合作”三部曲对外政策的立足点是在西方。法国取得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看它能不能取得单独以大国身份同苏联对话的资格，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国地位。要作到这一点，当然须争得对美国的独立，而发展法苏关系又必然会加强法国同美国打交道的资本。一个受美国制约的法国不可能认真推行自己的对苏政策，完完全全推行自己的独立自主政策。曾任美国驻苏、驻法大使的查里斯·波伦把这个政策讽刺为“我行我素”，这正是戴高乐二三十年来一直向美国争取的东西，也是戴高乐主义的灵魂。

戴高乐在1958年面临着一个不完全如意的现实：欧洲经

济共同体于1月1日成立了。从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标志着西欧联合在发展中。欧洲共同体固然已经不是按照联邦主义者的构想组成的，但是从它的发展看，在理论上并不违背联邦主义；“超国家”的影子总在那里徘徊。戴高乐是彻底否定“超国家”的理论的，但是欧洲共同体的现实却只好接受，他唯一能作的，是把欧洲共同体按照他的意图加以塑造。

戴高乐有一幅自己的欧洲建设蓝图。他认为，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意义出发，或出自战略上的考虑，欧洲都应该自成一体，这是一个把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所覆盖的国家联合在一起的欧洲，它应该成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世界三大势力之一”。所谓“欧洲应该是欧洲人的欧洲”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

这个联合起来的欧洲又必须是“多国家的欧洲”，“祖国的欧洲”。戴高乐说：“国家，是唯一有效的因素。”“祖国是一个有情感的名词……”戴高乐认为必须承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建立联合起来的欧洲。他形象地说，如果但丁、歌德、夏多勃里昂都变成了无国籍的作家和诗人，都用这种或那种世界语来思考，来写作，他们还能对欧洲有很大贡献么？所以，在当前，除掉“多国家的欧洲”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另一个什么欧洲。否则，那只能是一个神话当中的、虚构的和空想的欧洲。

当时欧洲建设问题，除了有一个法、德、意、比、荷、卢六国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外，大多还属于政府上的探讨。因此，戴高乐首先必须在共同体内贯彻他的“欧洲观”，设法

减少共同体的“超国家”色彩，把“祖国的欧洲”的成份注入共同体的血脉中去。1959年10月13日，戴高乐正式建议共同体六国就政治问题举行定期磋商，建议在巴黎成立秘书处。第二年夏，戴高乐再次提出讨论建立欧洲政治联盟问题。1961年2月，六国首脑原则上同意建立政治联盟。7月18日，六国领导人在波恩举行会议，决定举行政治协商，并且委托以法国大使伏歇为首的委员会起草建立政治联盟的方案。

戴高乐再三提出的政治联盟，与联邦主义者的政治一体化思想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戴高乐的意思是：建立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盟，并由此削弱“超国家”的影响。但其他成员国，尤其是比利时、荷兰等小国，则要借此推进一体化，使之具有“超国家”性质，并力争把共同体首先扩大到英国。1962年1月，伏歇委员会提出政治联盟的修改方案，突出主权国家联合的概念。比、荷等国为了抵销法国影响，竭力主张邀请英国参加讨论。4月，荷兰和比利时明确表示，只有接纳英国参加共同体，荷比才准备讨论法国总统的建议。当时，共同体六国和英国代表正在就英国加入共同体问题进行艰难的谈判，戴高乐坚决加以抵制，在1963年1月29日拒绝了英国的申请。

竭力主张逐步提高共同体“超国家”性质的比利时王国外交大臣斯巴克，批评伏歇计划说：“我们希望要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我们最不喜欢的东西却都在里面了。”

戴高乐否决了英国的申请，他的政治联盟计划则由于其他成员国的反对而作罢。伏歇计划夭折了，戴高乐继续为主权国家的原则和利益而斗争，以至出现了半年之久的“空椅

子危机”，几乎使共同体濒临分裂的边缘。

1964年10月2日，由联邦德国的哈尔斯坦担任主席的共同体委员会向部长理事会提交了一份题为《一九六四年倡议》的文件，建议加快“共同体体制”各阶段一体化的进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提前废除成员国之间所有工农业关税和建立统一的对外税率，即从罗马条约规定的1970年7月1日提前到1967年7月1日。

戴高乐对于任何削弱民族主权的因素都是十分敏感的。他在12月31日的全国广播讲话中明确提出，法国必须在政治、经济、金融和防务等各个领域内成为自己的主人，任何经济体制只要同“超国家、一体化或大西洋主义”联系起来，就难免把西欧置于某种霸权之下。戴高乐指示法国代表坚决反对《一九六四年倡议》。

1965年6月20—30日，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农业政策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以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的一方，主张提前实行全面控制共同体农业的计划。法国则坚决反对，法国外长顾夫·德姆维尔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延长临时农业方案的建议，主张继续实行农业出口补贴、从共同体以外进口的农业品征税属于有关国家。总之，前者在于扩大共同体对农业行政政策的权限，后者则相反，竭力维护本国的特殊利益。两种意见坚持不下。7月1日凌晨，顾夫·德姆维尔受命宣布，协商失败，会议休会；法国决定暂不参加共同体的会议，从此开始了为时半年的“空椅子危机”，法国的坐席空缺了半年。

“空椅子危机”实际上是戴高乐的一种边缘政策外交。但是，戴高乐毕竟不能，也不想把共同体搞垮。机器还需要运转，需要持对立意见的双方给机器注上一些润滑油。这润滑油是1966年1月17—18日共同体部长理事会通过的“卢森堡协议”。

卢森堡会议是半年来第一次六个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会议一开始，顾夫·德姆维尔代表法国政府就改进共同体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提出了十点建议，其中有委员会在采纳成员国提出的建议之前必须征求所有成员国的意见，各成员国的政府可以对共同体的预算实行监督等。法国还提议修改共同体的表决办法，建议不再提多数通过的原则；共同体委员会主席本人无权接受非共同体国家大使的国书，等等，以严格限制共同体委员会的权力。

六国外交部长总算取得了妥协。会议公报说，在共同体根据多数表决原则作出决定的条件下，如果一国或数国认为该决定涉及本国重大利益时，部长理事会应设法寻求“一致协议”的方案。公报还规定，非共同体国家派驻共同体的大使得同时向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和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呈递国书。

卢森堡协议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历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削弱了罗马条约的“超国家”因素，实际上确认了戴高乐“多国家的欧洲”的原则，承认成员国拥有“否决权”，只要有一个成员国坚决不同意，共同体就作不成决议。

戴高乐没有放弃这个权力，第二年，法国再次否决英国政府的第二次申请。英国得出结论：戴高乐在世之日，英国

加入欧洲共同体肯定是无望了。

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法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一个重大政治障碍搬掉了。戴高乐还认为，中苏关系已经恶化，法国在着手改善同苏联关系的同时加速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提高法国的身价无疑是大有好处的。他开始认真考虑同中国这个伟大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问题。

戴高乐在科龙贝隐居的时候，就读过在第四共和国期间当过总理的爱德加·富尔写的一本中国访问记：《蛇与龟》，富尔在书中提出法国应该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中法交往日见频繁、建立正常关系的条件日趋成熟的时候，戴高乐想起了《蛇与龟》的作者。

1963年9月的一天，戴高乐夫妇邀请富尔夫妇共进午餐。席间，戴高乐要求富尔以法国总统代表的名义再去一次中国。富尔动身前拿到了戴高乐致中国领导人的一封信，富尔充当了名副其实的总统信使。

富尔夫妇在北京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很有积极意义的谈话，中法建交只是时间问题了。双方会谈后于11月2日拟定了一个“议定书”。富尔把会谈的情况先用书画形式向戴高乐作了汇报。22日，戴高乐会见从亚洲回来的富尔。这时中法建交的工作差不多已准备就绪。

戴高乐决定同中国建交，必须克服两个阻力：蒋介石的干扰和美国的压力。

1957年，当富尔第一次访华时，他从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得到了一个极深的印象，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作法，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是中国人

民的合法政府。戴高乐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

国民党当局从1963年10月起，开始加紧活动，企图干扰和动摇戴高乐的决心。12月24日，蒋介石给戴高乐写信，要求澄清法国政府是否准备改变同中国关系的现在方式。戴高乐于1964年1月14日复信，信中礼貌地表示对蒋介石本人如何怀有敬意和个人友情，但实际上却是为了说出下面的几句话：“我应该告诉您，确确实实，我的政府不久将同建立在北京的政府开始缔结外交关系……出现在大陆中国并已确立的形势同我们过去所能预计的，是不相符合的。法国不能长期无视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

接着，戴高乐派遣了曾任驻国民党当局大使的佩切科夫将军拿着这封信去台北面见蒋介石。戴高乐想尽量作得周到些，但无意听从蒋介石的劝阻。

1月27日，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国民党当局在法国的“代办”向法国外交部发出了“抗议”照会。2月10日，法国政府声明：即将到达巴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使团将是中国的外交代表，因此，台湾当局的“外交使团”将因而失去存在的理由。

美国更是千方百计地向戴高乐施加压力。1963年11月5日，戴高乐接见了美国驻法大使波伦。12月16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会见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

1964年1月7日，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夏尔·吕塞约见波伦，告诉他法国已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几天后，法国驻美大使埃尔韦·阿尔方也受命通报美国国务院，法国

政府已在部长会议上作出了同中国建立政治关系的决定。阿尔方还说，法国政府认为，中国正在走与苏联不同的独立道路，它已不再同苏联组成杜勒斯生前说过的那种铁板一块的集团。1月16日，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哈里曼向法国大使递交了表示强烈反对的照会，说什么法国此举违反了“自由世界的利益”，照会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断然拒绝。以后，美国仍一再表示“遗憾”和“失望”，但都已无济于事了。

中法建交后，双方迅速任命了各自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黄镇和吕西安·佩耶。佩耶于5月27日抵达北京，31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呈递了国书，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气氛友好的谈话。6月6日，黄镇在巴黎向戴高乐总统呈递了国书。19日，戴高乐再次会见黄镇，表示希望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

戴高乐作为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外交家，一直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于美、苏关系上，使法国得以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最大程度的发言权和自主权。同时也致力于处理欧洲建设的事务，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人的欧洲”。

当然，戴高乐也没有忽视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戴高乐1958年重掌政权后曾经有过一个短期的“法兰西共同体”阶段：除了几内亚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对票宣布独立以外，其余殖民地都成为“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国，享有除国防、外交以外的一定自治权。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持续发展，所谓法属非洲国家都在1959年后陆续宣布独立，“法兰西共同体”也就结束了。从此，法国便通过各种双边的或多边的条

约，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同它们保持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军事上的联系。

拉丁美洲号称美国的“后院”，但法国也曾经在这个地区有过自己的影响。戴高乐于1964年3月15—24日访问墨西哥和法国在西半球的领地。同年9月20日至10月16日又用了约一个月的时间访问了南美十国，加强了法国同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戴高乐自创建第五共和国以来，一直把主要精力集中用于法国的外交事务，他不仅是杰出的外交家，而且是外交战略家。他为了维护法兰西的民族独立而表现出的不妥协精神，为法国赢得了国际声誉和地位，并为它在东西方关系中争得较大的活动余地。以奉行独立政策为基本特性的戴高乐主义，不仅在法国延续下去，而且越过边界，对西欧产生强大影响。当戴高乐向美国的权威挑战时，法国似乎只是一马当先，北约内的一些西欧国家还不得不附和美国的调子，对戴高乐持某种批评态度。但是，没有多久，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就产生了很大的感染力。在戴高乐去世以后，西欧普遍出现了所谓“戴高乐主义”、“新戴高乐主义”等政治思潮，要求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改善关系。争取欧洲的安全和缓和的呼声终于促成了1975年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

第五章 回天乏力——八十而终

戴高乐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法国的独立和主权，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对西欧其他国家如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总书记维利·勃兰特，在任联邦政府总理以前曾经同戴高乐进行过几次长谈，感到很受启发，踌躇满志地自问：为什么只有他能这样做呢？

然而，决定戴高乐命运的赌注最终还是在国内，戴高乐在国际上取得的地位掩盖着他在国内声望的下降。

经济情况尚可差强人意。战后的经济复兴在第四共和国后半期已经开始，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法国经济发展更快。1967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人达2200多美元，超过了比利时、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通货膨胀率也大为下降，国库转亏为盈。1959年下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3%，1960年上升达7.9%，1961年上升了4.6%，1968年上升了6.8%。这一期间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5.4%，农业生产增长了5%。不仅战争时期留下的创伤愈合了，而且第四共和国时期那种捉襟见肘的状态也消逝了。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经过一段经济恢复时期，进入了西方舆论界所说的战后“黄金时代”，以电子工业为先导的新兴工业正悄悄地、但却迅速地向法国迫近，就要叩法国的大门了。

战后十多年来，法国人口增长率提高了。60年代的法国社会是青年人的社会，到1966年，20岁以下的青年占总人口的34%。50年代的幼儿要步入大学，巴黎大学人满为患。人们在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青年问题将为社会提出什么样的难题；正陶醉于外交辉煌成就的戴高乐将军，更完全没有想到，在巴黎偏远的农泰尔文学院的一支引爆雷管正在发热。

法国经济的发展没有给戴高乐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增加多少政治资本。戴高乐一生中最讨厌的是所谓“政党政治”，总想方设法限制政党在决定国家重大事务中的作用。1958年9月，交付公民投票表决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和1962年10月关于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的公民投票，首要目的都是要加重总统的决策权、限制政党的影响。

加强总统的权利，戴高乐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做到了。至于限制政党的影响，却困难得多。政党依然林立，每当选举或公民投票时，总有一些新名目的政治组织出现。在法国，任何一个政治家，离开了某个政党，就很难在议会政治中活动。

1967年的议会选举中，戴高乐派仍然稳拿了多数。不过，这既不能保证戴高乐的政权不受冲击，也不意味着社会的稳定。在法国的政治中心巴黎，一大片包蕴着疾风骤雨的阴云正浓浓地低垂着。

随后的1968年是戴高乐交厄运的一年。由农泰尔文学院的青年学生掀起的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造成了戴高乐政权的危机。

农泰尔文学院本来是平静的，后来由于新生增多，出现了许多问题。学生们首先提出了履行传统教育体制的要求。他

们认为：法国传统的教育制度限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生活的自由，主张取消严格的考试制度；学生应该参与学校的管理。1967年12月以来，学生们开始了抵制考试的运动。运动迅速带有政治色彩，从反对校规到反对越南战争，从要求绝对自由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运动的口号五花八门，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以“新左派”自诩的群众组织，有的以托洛茨基为招牌，有的打出格瓦拉主义的旗号，有的号称“毛泽东共产主义小组”……学生中出现了一些颇有些号召力的带头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学系的德籍学生丹尼尔·科恩—邦迪。

1968年3月22日，科恩—邦迪领导的“三月二十二日运动”小组诞生了。这一天，在科恩—邦迪的号召下，七百多名学生占领了农泰尔的行政大楼，“三月二十二日运动”便因此得名。学校当局请求警察干预，矛盾陡然激化。

运动很快传播到了巴黎大学所在的著名的拉丁区，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大学。警察逮捕科恩—邦迪以后，对立情绪一下子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被激怒了的学生同荷枪实弹的警察发生了直接冲突。在蓬皮杜总理的过问下，关了12个小时后的科恩—邦迪被释放。但是，局势并没有丝毫平息，示威行动继续发展，各派学生组织、各种倾向的社团多如牛毛，就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革命等各种问题，展开了空前狂热的大辩论。5月2日，巴黎大学当局宣布停课。教育部长佩雷菲特、内政部长伏歇束手无策。

也正是5月2日这一天，总理蓬皮杜和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动身前往伊朗和阿富汗进行国事访问。由司法部长

路易·若克斯代理总理的工作。蓬皮杜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下还要出国访问，以及晚些时候戴高乐同样不顾时局的艰危而照旧出访罗马尼亚，曾引起人们的许多议论和猜测。难道他们对国内的局势就那么坦然么？显而易见的是，总统和总理在处理这场危机的作法上是很不一样的。蓬皮杜在离开巴黎前曾经表示过，处理学生运动，既要坚定，也要灵活，否则则难于收拾。他把问题留给了总统。戴高乐则十分自信，也十分镇定。在他看来，对示威活动只能采取坚决镇压一途。5月3日，警察占领了巴黎大学，大批学生被捕，拉丁区成了由铺路石垒起的战壕，学生们用石块迎击警察。至5月6日。被捕的学生达四百余人，几百名警察和学生在武斗中受伤。

戴高乐丝毫不想却步，他决心把学生运动镇压下去，他指示代总理若克斯、内政部长伏歇和教育部长佩雷菲特绝对不对学生让步，巴黎大学驻进了武装警察，学生则用石块和街垒占领了拉丁区。10日夜晩，棍棒、防毒面具、催泪弹、铺路石块……拉丁区成了警察和学生的战场。学生们决定在13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行动。这时，法国总工会和民主工人联合会决定打破沉寂，也宣布将于13日举行总罢工，学生将和工人汇合在一起了。戴高乐一直处在愤怒之中，他决定：决不让步，被捕的学生不能释放，警察不能离开巴黎大学。

戴高乐决定以不妥协的姿态恢复社会秩序。几个月来闹得天翻地覆的学生运动，已是强弩之末了，这场把整个法国都卷进去的风暴，毕竟是自发而分散的，注定是不可能持久的。国民议会改选以后不久，占领巴黎大学主要建筑物的警察们撤出来了，在运动中最活跃的组织被政府宣布为非法，

“五月风暴”终于平息下来。

戴高乐念念不忘通过一次公民投票来挽回“五月风暴”造成的损失，并巩固改选议会取得的成果。于是，他指定了一个小组起草改革方案，准备在适当时机交全民表决。

历史注定不让戴高乐有片刻的安宁，戴高乐方案小组正进行工作，国际事务又吸引了戴高乐的注意力。8月21日，苏联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9月9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和行径，指出苏联此举影响了欧洲缓和的前景。戴高乐说，“缓和、谅解、合作”政策首先是一项和平政策，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于给缓和势头泼了一盆冷水。同时，这给法国改善同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因为苏联出兵捷克，在西方引起了一致的谴责。

1969年2月4日，戴高乐接见了英国新任驻法大使克里斯多芬·索姆斯。索姆斯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老搭档、老对手丘吉尔的女婿。会见表面上是亲切的，戴高乐照例表示希望看到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关系，西欧大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应该在政治上和防务上加强合作。戴高乐告诉索姆斯，法国认为，西欧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于北大西洋公约的防务。索姆斯表示英国一向重视欧洲的合作，但同时也表示英国一向重视北约的作用。

会见后，索姆斯把谈话记录的全文寄回英国外交部。不料英国外交部竟把这场谈话记录全文公开发表了，一时在西欧——特别是在欧洲共同体其他几个成员国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应，似乎戴高乐已经改变了一直否决英国加入共同体的政策，准备把共同体的大门向英国敞开。几天后，法国外交部

照会英国,批评英方把一份未经法方同意的记录稿公诸于世。英国则说,谈话的记录稿曾经交给法国总统府秘书贝尔纳·特里科,转请戴高乐审阅和修改。两天后,法国外交部长米歇尔·德勃雷向索姆斯确认记录稿是准确的,并且把稿子退给英方了。于是,刚刚有些转机的英法关系又紧张起来。报界耸人听闻地称为“索姆斯事件。”戴高乐十分恼火,说英国公然违反外交上保守秘密的惯例。英国人则说是上了戴高乐设的“圈套”。当然也有人推测,戴高乐确实想把同英国的紧张关系悄悄地缓和一下,不料英国把谈话记录稿公布了,这很有损于将军的尊严,英国人干了一件失之鲁莽的事。

总之,戴高乐自从把法国从北约军事组织中撤出以后,在外交上就不再有什么大的动作了。经过1968年的“五月风暴”,他意识到自己在国内的根基并不如想象那样稳固,必须把主要精力转向国内问题,改善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关系问题,在当时仍然摆不上戴高乐的正式日程。将军已经感到精力不济了。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改革方案就绪。方案全文共68条,4000多字,内容十分琐细。2月2日,戴高乐在布列塔尼视察中发表演说,宣布:在当年春天把全国区域化和改造参议院两项方案提交全国选民。

所谓全国区域化,说得简单些,就是恢复1789年革命前那样的行政区划,每个地区的议会部分选举、部分由政府任命。而参议院的改革则涉及到参议院的性质问题,改革以后的参议院不再是由95个省议会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而是一个包括各地区代表的咨询性机构,它将研究和审议各项有关

政策草案，然后再提交国民议会。这两项改革方案，本质上都是开倒车的，一个意味着对 1789 年成果的否定，另一个则削弱了参议院的权力和议会民主。因此对于有民主传统的法国选民来说，是不可能受欢迎的。有人说，如果在公民投票时直接了当地提出是否拥护戴高乐总统本人，他获得多数支持的可能性也许要大些。但现在他提出的问题却会使本来支持他的人投了反对票。问题有其复杂之处。传记作者之一贝尔纳·路德维支说，戴高乐所作的是要以“保守的姿态”去实现“根本的改革”，同时又提出，选民应在“进步和动乱”之间作出选择。这时，蓬皮杜已经透露，如果总统职务空缺，他将参加新总统的竞选。于是，人们便感到，公民投票说到底是在“戴高乐或蓬皮杜”之间选择一个，改革内容如何倒在其次了。

2 月 19 日，内阁会议宣布，公民投票将在 4 月 27 日举行。戴高乐在回答电视台记者米歇尔·德鲁瓦时说，两种改革方案是紧密相连的，选民们在投票中只能回答赞成或反对。如果多数选民投反对票，他将立即辞职。此外，戴高乐还一直幻想推行劳资“合作”的方案。他在回答德鲁瓦的提问时曾解释说，“合作”的目的是使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分享企业的利润。这样的解释对于一般选民来说似乎语焉不详，但却增加了企业家们的狐疑和不满，因为这就是说戴高乐将要求企业家们交出一部分利润，以缓和各社会矛盾。于是，相当一部分拥护戴高乐的中产阶级在公民投票中将改变态度。此时一些相当有影响的政界人物，如吉斯卡尔·德斯坦等都先后声明：对改革方案投不信任票。各个政党（除戴高乐

派)和工会也都动员它们所能影响的选民投反对票。将军感到局势已对他十分不利了,但他仍要背水一战。

在总统竞选期间,戴高乐夫妇乘专机离开法国前往爱尔兰度假。79岁高龄的戴高乐将军,在离开政坛之后选择爱尔兰西南角濒海地区,去洗掉半个多世纪长途跋涉在他身上留下的风尘,也许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戴高乐的家族,严格地讲,有着爱尔兰的传统,他祖母就有爱尔兰的血统。

6月15日,总统第二轮选举结果揭晓,蓬皮杜以58.21%的多数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第二天,戴高乐从爱尔兰休养胜地给蓬皮杜发来了电报,对他的当选表示衷心祝贺。

1970年6月,戴高乐夫妇曾去过一趟西班牙,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访问。戴高乐宣布辞职以后,佛朗哥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到西班牙去休息一下。在马德里,戴高乐会晤了佛朗哥。戴高乐虽然同德国法西斯进行过殊死的斗争,对西班牙的独裁者却怀有敬意。在风光绮丽的别墅,他住了二十几天,和助手们整理撰写回忆录的资料。

戴高乐还收到过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信,并决定在1971年合适的时候访问中国。但是很遗憾,他没有能等到这一天。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照常工作了一整天,当晚,因心脏病突发猝然逝世。再过13天,他就整整80岁了。

夏尔·戴高乐逝世,长眠在橡木做的棺木里。科龙贝教堂上空回荡着悼念的钟声。

第二天中午,蓬皮杜总统发表广播演说:“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

戴高乐在遗嘱中写道不要授予他任何称号和勋章。

一切都按照遗嘱，墓碑只写了“夏尔·戴高乐（1890—1970）”几个字。他最心爱的小女儿安娜早在那里安葬了 22 年。